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第 21 屆碩士論文

「九二海戰」之官方建構
The Offi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Naval Battle
of September 2nd, 1958



指導教授：劉 曉 鵬 博士
研究生：洪 年 建 撰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十二月



摘 要

「九二海戰」為「八二三戰役」期間，我海軍與中共發生在金門附近的夜間海戰，這場戰鬥即便兩岸對於戰果上有不同論述，在經過我方對形象的建構與宣傳後，成為了反攻復國勝利的第一仗，所創造出的海軍「台海精神」更堪比陸軍「黃埔精神」及空軍「笕橋精神」。

本文以形象的相關理論，結合我國防部檔案中敘述當時士氣低落情況，藉此重新詮釋「九二海戰」。作者認為該戰役為一個形象建構的過程，是戰後以圖像、性別、慶功宴、及紀念塔，所建構出的勝利。其次，以每年對「九二海戰」紀念日的宣傳為基礎，分析相關的印刷品及慶祝大會，認為實質上是反映出對於官士兵的規訓。本研究認為即使「九二海戰」的戰況並不清楚，但從過去到現今，隨著時間與政治環境的演變，卻隨時有新的詮釋。

關鍵字：九二海戰、中華民國海軍、鏡像階段、蔣介石、台海精神



ABSTRACT

The “Naval Battle of September 2nd” was a cross-strait naval battle at midnight near Kinmen in 1958. There are different discourses on the result of the battle, however, in Taiwan’s propaganda, it becomes the first significant victory of the Navy, 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Army and the Air Force.

To analyze this battle, this article uses the theory about image to review the low morale situation described in the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hen to reinterpret the “Naval Battle of September 2nd”.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battle is a official-image construction process, a victory that was constructed from images, gender, celebration banquets, and monuments after the war. Moreover,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printed materials and ceremonies of the “Naval Battle of September 2nd”, arguing that these publicities essentially reflect the discipline of the Navy. This study contends that even though the result of the “Naval Battle of September 2nd” is not clear, but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re are new interpretations with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environment.

Keyword: Naval Battle of September 2nd, R. O. C. Navy, mirror stage, Chiang Kai-shek, Taiwan strait spirit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4
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架構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
第一節 形象相關理論回顧	7
第二節 「九二海戰」精神戰力分析	19
第三節 兩岸眼中的「九二海戰」	21
第三章 九二海戰的重要性	31
第一節 海戰前的士氣評估	31
第二節 需要形象的時代	45
第三節 建立理想的形象	47
第四章 建立勝利形象	53
第一節 彈孔、鋼盔的隱喻	53
第二節 建構英雄的女性	59
第三節 象徵榮譽的虎旗與勳章	62
第五章 規訓的重現	69
第一節 軍事新聞的規訓	70
第二節 傳唱的軍歌	80
第三節 九二台海勝利紀念碑	83
第四節 定時的紀念慶祝會	85
第六章 結論	89
參考文獻	93

表 次

表 2-1 「九二海戰」敵我雙方參戰兵力比較表	23
表 2-2 我國有關「九二海戰」文獻敘述統計	25
表 2-3 中共有關「九二海戰」文獻敘述統計	26
表 2-4 「九二海戰」雙方敘述差異比較表	28



圖次

圖 1-1 研究架構圖.....	6
圖 2-1 神話論述系統圖.....	11
圖 2-2 「葛瑞絲」颱風警報單.....	27
圖 3-1 從拉岡的「L 圖示」對照海軍自我建構圖.....	47
圖 4-1 陣亡士兵悼念儀式擺設圖.....	54
圖 4-2 沱江艦長手持殉難官兵鋼盔圖.....	55
圖 4-3 沱江艦上陳列戰損鋼盔.....	55
圖 4-4 沱江艦被友艦拖帶圖.....	56
圖 4-5 沱江艦艦體戰損.....	58
圖 4-6 沱江艦艦體彈孔.....	58
圖 4-7 沱江艦舷窗被擊破.....	58
圖 4-8 艦艇遭砲火攻擊之彈孔.....	58
圖 4-9 沱江艦官兵接受佳麗獻花.....	60
圖 4-10 佳麗對艦長劉溢川致意.....	62
圖 4-11 運補後香港紅星勞軍.....	62
圖 4-12 頒授沱江艦之虎旗.....	63
圖 4-13 沱江艦官兵與虎旗合照.....	64
圖 4-14 參謀總長交付虎旗.....	64
圖 4-15 沱江艦艦長接收虎旗.....	65
圖 4-16 全體向主席敬禮.....	65
圖 4-17 總統與海戰有功官兵.....	66
圖 4-18 總統與沱江艦官兵合照.....	66
圖 4-19 蔣經國先生與沱江官兵照.....	67
圖 4-20 總統與各部隊長合照.....	68

圖 4-21 總司令與沱江艦長合照	68
圖 5-1 報紙版面中潛艦與沱江艦	73
圖 5-2 「九二海戰」插圖.....	75
圖 5-3 明星穿著海軍制服照	87
圖 5-4 海軍艦艇官兵在艦艙舉行宣示效忠大會照	8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九二海戰」發生於民國 47 年 9 月 2 日，正值「八二三戰役」期間，我方因應當時人員及裝備運往金門之需求，海軍由南巡支隊三艘艦船（維源、柳江、沱江），護航運補艦美堅號前往金門實施運補，途中遭中共偵獲並派遣魚雷快艇及砲艇數艘攔截襲擊，午夜時刻於料羅灣附近海面雙方發生激戰，最終我方統計共擊沉中共魚雷快艇 8 艘、大型砲艇 2 艘及重創 2 艘，另沱江艦單艦擊沉共軍快艇 5 艘，重創 2 艘，但也遭擊傷，陣亡官兵共 11 員，並由友艦拖返馬公，後因評估無修復價值而除役。然而因戰功空前，且對整體戰役勝利有關鍵性影響，使前海軍總司令黎玉璽上將認為「此戰役樹立起象徵忠義的『台海精神』，與黃埔精神、笕橋精神相互輝映。由於台海精神的高度發揚使全世界的人士都認清了，世界問題的中心在東亞，東亞問題的重心在台灣」（〈發揚台海戰役精神〉，1962），於是我海軍每年舉辦「九二海戰」勝利慶祝大會，至此「台海精神」得以傳承。

傳承至今，其實中華民國海軍目前共出現三次沱江艦，第一艘即是「九二海戰」的參戰艦艇，於民國 37 年美國依據「中美租借法案」，移交我國修整服勤之 300 多噸巡邏艦（我國賦予舷號 104），續因海戰後受創嚴重，於民國 47 年 11 月除役；第二艘是原沱江艦除役後，美國依據「中美聯防條約」，於民國 48 年 7 月贈與我國同一型艦，並且我方為紀念「九二海戰」功績，再次命名為「沱江」（我國賦予舷號 125），接續於民國 60 年因裝備老舊除役（張壽齡、江毓鉉與周宜慶，2015：107-109）；第三艘即是另一重要里程碑，為民國 103 年由我國自主建造之 500 多噸「高效能原型艦」（舷號 618），又再一次以「九二海戰」

中，戰功最高之「沱江艦」為命名，前國防部長嚴明在主持沱江艦的交艦儀式上強調，當年的冒險犯難精神奠定勝利基石，是國軍表率，沿用命名不只是緬懷過去，也是創造歷史，具傳承意義(呂欣懌，2014)。

到了民國 105 年 6 月，蔡總統登沱江艦視導，並發表重要談話，內容中提到，60 年前的沱江艦，隻身抗敵、奮勇作戰。最後官兵陣亡 11 人，中彈七十多處，並訓勉「在海軍裡面，沱江艦有兩個重要的意義。第一，沱江艦象徵著以小搏大、以寡敵眾的精神，同時也象徵著海軍軍魂。…」，這一席訓示，揭示了當年那場戰爭的舉足輕重地位(中華民國總統府，2016)，沱江艦也為蔡總統就任後第一艘登艦的海軍艦艇，更確立了對海軍的重要性。

這重要性也反應在制敵方面，中共近期航母發展迅速，2016 年 12 月中共第一艘航母「遼寧號」編隊，已經通過第一島鏈，並且在我國周邊海域活動，2019 年 12 月第二艘航母「山東號」亦加入中共海軍，面對中共威脅，我國新型沱江艦由於體積小、機動性高且配備有反艦飛彈，具有不易被偵獲且火力強大特性，因此曾有被稱作「航母殺手」一說(戴志揚，2019)，另外由於航母編隊艦艇數量多，利用沱江艦造成對岸航母的威脅，得以勾勒出當年沱江艦「以寡敵眾」的態勢。

沱江艦在對岸也有留名，只是故事不一樣，2019 年 9 月，中共解放軍舉辦「我的家鄉我的艦」主題宣傳活動，其中宣揚中共「泉州號」為「海上猛虎艇」稱號的第四代繼承艦，並有一說為第一代「海上猛虎艇」曾參加過「九二海戰」，並且擊沉沱江艦(徐鳳佳、莫小亮與周小舟，2019)，這樣與我方矛盾的描述，引起了探究雙方對於戰鬥有不同詮釋的動機。

有關海軍對本戰役的陳述，除了宣傳的內容外，在事隔二十九年後，青年日報曾特訪姚道義支隊長，追憶這場自述為「一生最長的一

夜，至今歷歷在目」的海戰，並指出當時他率南巡支隊自馬公發航往金門，凌晨零時三十四分時，海上一片漆黑，在掩護美堅艦作業期間，忽然數批共軍魚雷快艇來襲，那幾乎是一場「看不見的戰爭」(汪珍，1987)。

由於這「看不見」的說法，引起筆者回想從民國 91 年進入海軍軍官學校就讀，至民國 95 年畢業服役於海軍，迄今已十四餘年，對於「九二海戰」印象最深刻，即是那場海戰大獲全勝，並且每次進出軍營裡面的哨口時，必定會看見那高聳的紀念碑，但就海戰的過程、戰術、戰法而言，卻未有深刻印象，在查找資料過程中，由於中文資料有差異，西文也相當有限，對此激發出一種更想求知的心理，因此這樣的差異性成為追尋認知與學術重要性的原因。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主旨在於探討「九二海戰」的形象建構。茲將研究目的與問題分述如下。

壹、研究目的

從「看不見」的過程以及「看不見」的敵人，卻被塑造成空前勝利，半世紀以來成為海軍最重要的事蹟，而目前在有限的學術研究中，僅有國內學者針對國共文獻在戰果描述異同方面做整理比較，以及精神戰力運用為論述主軸，缺乏對其如何建構之分析，因此本研究目的，主要分析「九二海戰」勝利的建構背景，並探究建立勝利形象的過程與手段，最後了解所創立的精神戰力，發揮的規訓與演變。

總體而言，以形象相關理論來重新詮釋海戰的定位，並從文獻與國防部史政檔案中，分析在當時兩岸關係的條件下，如何透過我者、他者的身分塑造，藉性別、敘事與圖像取代戰事本身，並從傅柯

(Foucault)對於規訓的想法，最後成為規範社會與海軍的工具。

貳、研究問題

從戰爭史上觀察，歷史容易成為參戰各國主觀的陳述，隨時間變遷，更有不同的詮釋，尤其在沒有第三方在場時，更容易產生勝負互見的狀況，然而我國與中共自民國 39 年到今日，發生海戰共數十次，不乏戰果與傷亡，為何是以「九二海戰」作為反攻復國的象徵？另外海軍對於「九二海戰」輝煌的勝利，是如何從無形象至有形象？及其所建構出的形象對於海軍又有何影響？

該海戰發生迄今，已過六十餘年，除了當年頒授榮譽旗以及慶功宴，在海戰後的第六年，海軍在左營海軍基地內的一個門哨前，興建一座象徵勝利的「九二台海勝利紀念碑」，並在往後每年以各式活動紀念此戰果，由此可看出海軍對於此戰役之重視，但隨著時空的改變，國共關係逐漸成為兩岸關係，在身份微妙的變化下，這場看不見的海戰在價值上是否隨之改變？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研究是採用質性研究，意指研究發現並非藉由數據統計程序或是其他量化方法所產出，在研究問題方面也並非以操作變項來設計，而是偏重於在情境中探討複雜議題，因此將可能涉及參與者的自身經歷、體驗、情緒、想法等，也可能延伸到組織、社會、國家甚至是文化現象間的相互關係。(潘淑滿，2003：18-24)

因此本研究部分將以筆者實際海上航行經驗，解讀文獻並提出觀點，且結合文獻分析法的以下優點，第一，文獻研究具有無反應性的優點，研究對象不會受研究者的影響而發生變化，雖可能受研究者主觀偏見的影響，但蒐集資料方法本身不會使正在蒐集的資料發生變化。

第二，文獻研究可以研究那些無法接觸的研究對象：由於某一事件已成為歷史，要採取調查、實驗及觀察已不可行，因此僅能透過與事件相關文獻進行探討。(張庭，2013：20-30)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的過程中，透過「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借閱系統」，蒐集相關既存檔案，以一種客觀界定與綜合證明的研究方法，作為此研究之分析基礎。

研究時間及內容範圍，主要以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後，至民國 47 年海戰發生期間，影響海軍士氣之事件、海戰檢討報告等有關之史料、專書與照片；海戰後各報社，包含青年戰士報（後改名為青年日報）、中央日報等，對於每年「九二海戰」紀念日的報導內容；以及有關該海戰的軍歌、紀念碑等相關資料作為研究範圍。

研究限制部份，由於部分檔案內容因檔案主管機關考量內容涉及作戰計畫，不宜提供應用，因此本研究僅針對已申請同意應用之檔案為主。

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架構

本研究在架構規劃中，先敘述目前對於「九二海戰」的紀念活動及國艦國造等主流議題，在沱江艦所象徵的歷史傳承意義等報導下，呈現「九二海戰」、「沱江艦」與反共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接著梳理當時海軍處在的背景環境及海戰前的狀況，這些狀況是如何成為「九二海戰」勝利的鋪陳，並整理兩岸對於「九二海戰」紀錄的文件，從雙方的角度來看對於海戰的詮釋。

另外在研究中，以我軍如何形塑一個他者，以及當時的紀錄影像、報導及想像為實例，論述關於「形象」建構的主題，因為勝利需求而強化的各項元素，從鋼盔、美女及不沉的軍艦等，以及之後建造的精

神紀念碑，從形象的刻劃及潛在權力關係的形成，論述出國軍如何建立勝利的自我形象並且加以宣傳強化，並分析探討各種元素中的權力關係。接續，隨著關係演變，導致的身份轉化下，對「九二海戰」的形象轉變及對於海軍的價值做出分析。並為之後「九二海戰」在海軍所扮演的精神意義作出說明。

結論的部分，綜整上述的各項重點，從我海軍的角度出發總結「九二海戰」勝利意義的角色，並融入現代軍隊管理的困境，期望能讓軍中的同仁不僅對「九二海戰」的精神有新的見解，並對爾後在部隊管理方面，亦有所助益。以下為研究論文的架構圖（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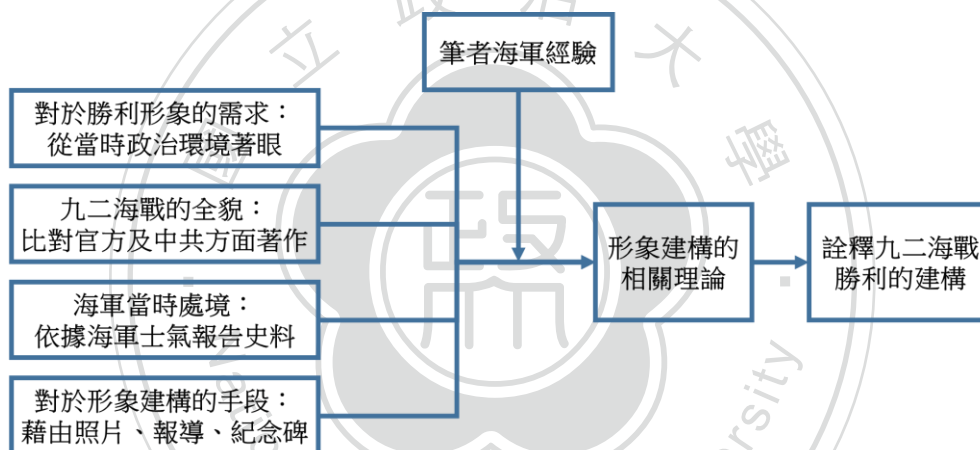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設計

第二章 文獻探討

「九二海戰」是在 1958 年「第二次台海危機」期間，重要海戰之一，中共當時企圖封鎖我金門地區，期間不惜發動發動砲擊及運用快艇打擊我海上運補艦艇，當時我海軍為達成重要運補任務，與共軍發生海上激戰，不僅成功完成任務，也使中共兵力重損，此為我國海軍在戰史上重要的一頁，也成為後續每年九三軍人節前，海軍以「九二海戰」發揚海軍忠義軍風並緬懷當年先烈，藉此舉辦多元活動，讓國人更了解海軍。

而在「九二海戰」的文獻中，較無以描述戰術戰法作為獲勝因素之分析，而多為過程文獻及戰後照片，這些資料包含想像、象徵、圖像、女人等元素，使讀者心中堆疊出勝利的場景，因此具有形象、宣傳及心戰等概念，而其中形象方面以雅各·拉岡(Jacques Lacan)的「鏡像階段」(mirror stage)理論為主流，宣傳方面涉及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神話學」(mythologies)，心戰也與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規訓思想有關，故本研究將從這些方面開始切入探討。

第一節 形象相關理論回顧

在許多文獻中，不乏對「形象」有諸多解釋，在各領域包含社會、經濟、政治、教育上都有深度的討論，並且也開始以形象作為原則(Morris, 1957)，並且常與其他理論結合運用，如宣傳、心戰等理論，為求研究範圍廣度，藉由其他理論與形象關聯，更了解形象的作用為何。

壹、基本形象

如在政治學的領域，形象是代表的政治人物，由內而外所散發出的特質(McCombs, Shaw, & Weaver, 2013: 31)；在教育心理學方面，則

以自我形象(self-image)，作為影響個人在面對失敗的承受度，以及學齡兒童在同儕間患病風險之重要因素(Salkind & Rasmussen, 2008: 393, 448)，因此在不同領域中，對於形象的解讀將有所不同，為了後續研究聚焦，故需先針對適用的形象理論範疇內進行回顧。

一、形象的概念

Boulding(1956: 175)認為形象指的是以往的經驗所累積建構而成的，所以形象就是對內在的反映，是由內而外所產生，透過形象可以與使與對方發生交流，而這交流的具體表現，定義為印象、意見、態度等的綜合體，也是對個人，甚至是對國家最簡明的描述(Merrill, 1962)，因此透過某些敘述便可以很快的聯想到對應關係的事物。

形象也是能夠轉變的，就像國家形象也可以透過政策做改變，如1952年末韓戰時，中共採取「和平統一戰線」，以及在韓國與越南的行動，成功的在當時建立和平形象(Brooks, 2019)。

但這樣的描述從存在論的角度思考，由於形象是一種經驗、時間、歷史、知覺的匯聚，並且透過有所意圖的顯現，因此與事物的本質有了不一致性，對此哥特佛萊德·伯姆(Gottfried Boehm)提出形象不存在本質的看法(Elkins & Naef, 2011: 155)，從而可以看出，形象存在某種可建構性。

二、形象的構成

形象的構成有許多方式，從大眾傳播來說，對於形象的展現，並不僅只於圖像或是視覺的傳達，甚至是包含聲音、語調及整體運作下的綜合結果，充滿情感與期待之關係(Ranciè & Elliott, 2009: 6-7)，也就是雖然可見物、語言以及攝影技術是三種分門的類別，但是透過整合的操作，使得可說與可見之物產生了關聯，

並有了更多的圖像功能(foundation image)。

(一) 語文與形象

形象可藉由平面雜誌的語文來傳遞，John C. Merrill(1965)分析「時代雜誌」中，論述了媒體對杜魯門(Truman)、艾森豪(Eisenhower)及甘迺迪(Kennedy)所塑造的形象，並歸納出共 12 種媒體播報手段，包含片面報導、以形容詞與副詞強化語意、參雜非相關敘事、無法查證的字句等，使得事實在透過這些技術性的報導方式後，形象將得以重建，因此，在我們在社會中大部分的知識與訊息都是透過語言跟文字所獲得，並在被動接收訊息的情況下，被期望的形象也因應而生，從這可以看得出形象可塑性。

(二) 圖像與形象

另外這些報導刊物中的照片也具有傳遞及塑造形象功能，Lawrence J. Mullen(1997)從 1945 年至 1974 年部分雜誌刊載之美國總統照片，分析影像處理及形象塑造的關係，發現隨著世代進步，攝影技術及設備的演變，使得相片的呈現有不一樣的形象效果，如更細膩的捕捉主角臉部表情的細微變化而使得分析心境，以及側面照成為信賴的象徵。所以從圖像在象徵意義傳遞上的力量，展現出了形象可以被建構的多元性。

因此，從形象的概念、定義與建構，發現形象的形成關係到本身特質、外在因素、相互關係及傳播方式等，而就傳播方式而言，也不局限於言語上或是視覺上，並且傳達的是一種意有所指的言談，如同在物質方面(包含聲音、文字等)的「能指」(signifier)與概念方面的「所指」(signified)之間關係的研究範疇，在學術界，

研究這類關係所產生的符號，以及意指作用等領域時，不可忽略羅蘭·巴特的重要理論「神話學」。

三、羅蘭·巴特的「神話學」

關於「神話學」這一理論，在此並非訴說古典神話的範疇，而是一門針對當下普羅大眾認知的自然現象，加以剖析而發現其中隱藏意識的學門，此理論源自於法國學者羅蘭·巴特的著作《神話學》，這是一本集合了巴特在1954年至1956年間，每個月為雜誌所寫的神話研究專題，以觀察在法國日常生活中的大眾文化產品為題材，發現看似自然的背後，卻實際藏有某種刻意的意識形態，並且拒絕沉溺於被世人認為的常識，企圖揭露這些欺騙的表象，在著作內的第二部分即以〈現代神話〉作為對理論的說明(Culler, 2002: 23)，讓人深切的思考究竟神話是什麼？

要了解神話的建構，就必須先了解，雖然所有的言談都有成為神話的可能，但仍必須知道神話的本質是如何，才能分析作為神話的過程。

(一) 神話學的本質

1. 神話是作為宣傳的體系

巴特認為神話是一種言談，但這言談並非只要透過具體的語言，就能達到神話的效果，而是需要特殊條件，其中包含措辭、表達，以及訊息傳遞的方式，甚至不局限於口語，也可能是照片、電影、報導、廣告等，都能當作承載神話的工具(Barthes, 1972: 107)。

2. 屬於符號學的體系

由於巴特在論述神話的過程中，與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語言學有相當程度的關聯，索緒爾認為的語言

符號是由「能指」與「所指」所構成，而巴特認為這構成的符號是在建構神話的第二系統中，重新扮演「能指」的地位。(Barthes, 1972: 110-111)，而這也是神話化的重要過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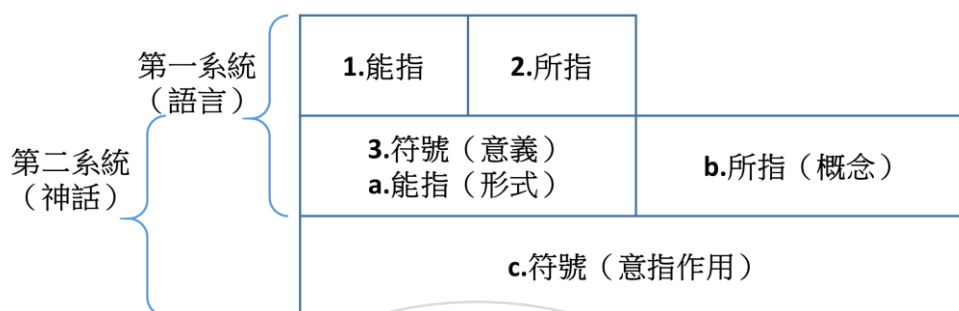


圖 2-1 神話論述系統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3. 神話的產生是因為過程而非對象

由於神話這種不受任何方式所限制，也就是各種素材都不僅無法定義神話，並且也能成為神話的支撐，而神話的宣傳，本身就是運用加工後的素材，這些素材有種事先告知的意識，因此在人們不知道本質的情況下，仍舊可以推敲神話的內容，這也間接的說明神話的運用方式，是以程序的角度著眼，也就是如何去表達神話。(Barthes, 1972: 108-109)，也因此突顯了神話過程的重要性。

(二) 神話的意指作用

神話的目的，其實就是在包裝需要宣傳的意識形態，讓接受者自然而然，不假思索的接受社會所需要的價值觀，便於讓統治者維持整體的權力結構。而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就必須要有一個神話的過程，而產生一種意指作用，這就必須從神話學的系統談起(Barthes, 1972: 115-117)。

在神話之中，必須先存在第一個符號系統，也就是語言學的體系，在這體系中，語言被區分為兩部分，一個是

「能指」，代表物質（包括聲音、文字），另一部分為「所指」代表概念，而兩者的結合就是所謂的「意指」(signify)，也就是「能指」因為有了「所指」，而成為有意義的「符號」(sign)。而神話是第二個符號系統，藉由第一個系統的「符號」，重新作為第二系統的「能指」，這時原本「符號」的意義，變成了一種形式，此時在賦予某種概念使其完整，就成為了「意指作用」，神話就此誕生，也意味著原本的意義被跟著改變(Barthes, 1972: 110-114)，且讓人能感知及被自然的接受，進而觸動了人們的想像力，開始口耳相傳(Burke, 1989: 51)。

最終，神話並不是將原本的事物隱藏，而是一種改變，在意義與形式間交互作用，產生既曖昧又理性、既想像又自然的型態(Barthes, 1972: 120-121)。

三、拉岡的「鏡像階段」理論

然而提到想像，二十世紀著名的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岡對此也有不同的研究，他對於想像提出了「鏡像階段」理論，從1936年第14屆國際精神分析學大會上發表論文開始，拉岡以這個理論就成了他的指標性觀念。

(一) 理論內容

拉岡於1949年第16屆大會發表《鏡像階段作為精神分析經驗中揭示的「我」的功能構型》，其中「鏡像理論」在拉岡不斷的反思下，由看似簡單卻趨於複雜且擴大(Evans, 2006: 117)，歷經了從對弗洛伊德理論的理解，到做出修正，以至於對「鏡像階段」的理論重述。

拉岡提出的「鏡像階段」理論是藉由弗洛伊德對於人

的「自我愛戀」所發展出，內容為嬰兒在 6 至 18 個月期間，因為看到鏡中自己的影像，開始意識到身體的整體性，並且可以藉由自己所掌控，也因此開始建構自我，然而畢竟實際上嬰兒對於四肢的運動能力有限，就在自我與鏡像間，產生的認知與實際上的衝突，最後選擇認同，這也就意味著人對於自我的建立是經由外界對自己的反映，使而產生在心理的作用，如同在鏡子前反射出自己的映象後，開始確立建構對自己的形象，並從而區別與他人的不同，因此經由此自我認證的過程，才会有接下來自戀或自棄等對於自我態度的不同發展，並且之所以要建立自我，是因為沒有自我，剩下的將會是支離破碎、無法統合的軀體，所以自我具有掩飾這種困境的作用，而鏡像階段的功能就是為了要維持住這種統合的表象(Leader, 2014: 26)。

(二) 他者的角色

但在完整統合的自體形象相對於支離破碎經驗開始生成時，由於無法協調而產生的強烈衝突，如同完整的影像威脅到本身的破碎感，從而有了攻擊性，但是他者其實並非真正的他人，而是自我的投射、自戀認同的對象，如同分身也是鏡像(Evans, 2006: 136)，這時他者成為了我們確認自己身分的保證，因為我們認為的形象是經由他者的目光而獲得的，但卻也是具有敵意的競爭者(Homer, 2004: 26)，這也是拉岡認為的小他者。

何謂小他者？而拉岡對於他者，在 1955 年清楚的區分「小他者」與「大他者」，「小他者」指的就是在「鏡像階段」中，那個由想像而成，並且看做是完整統一的形象，

是符合慾望的他者，而「大他者」即是語言與律法(Evans, 2006: 136)，從嬰兒時期的經驗，大他者就如同母親，母親滿足嬰兒的所有需求，而嬰兒也絕對依賴母親(Evans, 2006: 73)。

五、「鏡像階段」理論的延伸

(一) 鏡像中的電影

從前述概念，可以看見拉岡用「鏡像階段」解釋了自我的建立過程，這也是他所敘述的想像界中的重要概念，而這樣的觀念一直也在電影研究的範疇中產生莫大的影響，「鏡像階段」理論亦是常用來解讀觀眾及被投射在螢幕上形象之關係，路易·包德里(Jean-Louis Baudry)認為，從想像界的角度而言，電影螢幕就是鏡子，投射出的就是形象，觀眾在過程中，發生了嬰兒在「鏡像階段」中出現的分裂與認同，因此產生了「電影認同」。但克里斯蒂安·麥茲(Christian Metz)卻有不同的見解，認為「電影認同」可以當作是「鏡像階段」的過程，但不足以用想像界解釋，反而應從象徵界角度思考，觀眾應該屬於偷窺者角色，因此對於鏡像中形象，具有掌控力而產生滿足感。(Homer, 2004: 28-29)

(二) 女性的形象

「鏡像階段」中，嬰兒視母親為大他者，其實拉岡對於女性不僅以母親作為評論，他提出「女人不存在」來說明「女人」具有非生物屬性的陰性特質，並且認為「女人」這個詞彙與「陰性位置」(feminine position)同義，並僅存符號層的一個位置，這使得部分女性主義認為這種符號層

的概念是父權制度的壓迫(Evans, 2006: 222-223)。就像女性主義者所表明的一般女性成為被動的存在，並且在刻板印象下被塑造著，西蒙·波娃曾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一書中寫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De Beauvoir, 2010: 14)，這是說明女性的形象是被形塑而成的。

女性在社會價值觀的綁架下，往往產生比男性更多的限制，包含在肢體、姿態及動作，在約束下還必須保持優雅，尤其是臀部、胸部必須凸顯，卻又要避免淪不雅的指控(Bartky, 1997: 135-136)，女性的行為如同二元論，只有符合期待或不得體兩種，甚至是在穿著上也是如此，因此之所以女人在乎服飾的選擇，除了藉用外在服飾產生幻覺，並同時可以重塑女人內心的自我(De Beauvoir, 2010: 649)。

在父權的觀念，女人的形象似乎也能成為男人炫耀的手段，巴爾扎克(Balzac)在《婚姻生理學》(The Physiology of Marriage)中描述「女人確切地說，只是男人的附屬品」(De Beauvoir, 2010: 16)的命運與榮耀是贏得男人的心，如同以合約獲得的產物，0)。最終女人的形象被社會所牽制與規訓著，社會上無時無刻就像在監視著女人的一舉一動、一眸一笑，女人此時就如同是在敞視監獄的犯人，無時無刻被監視著，或者亦說是自己也認為在被監視著。

貳、形象與宣傳

之所以需要建構形象，其中很重要的目的不外乎就是為了宣傳(propaganda)，相對於以往的宣傳手段，新的宣傳除了著重讓接收者感到樂於接受外，並且運用模糊或縮寫字眼，讓接收者用自己的想像加以解釋(Graber, 1994)，這種富有暗示性指示的宣傳效果，就像是一種

誘導，使得宣傳不必要使用陰險的用詞，一樣能使得接收者變相的接受了宣傳的思想(Lippmann, 1998: 248)。

在中外的海戰史上，也有利用宣傳而達成政治意圖的例子，就像日本在甲午戰爭期間，所宣傳的圖象與報導，成為宣揚國威的利器，也由於當時相對於日本，中國對於宣傳相當不重視，不僅事實受到日本扭曲，國際輿論也多傾向於日本說詞，另以圖像對中國實施的負面宣傳，中國人的形象成為迷信、怯懦、粗鄙，最終國際上也充斥著日本的勝利是對世界有利的氛圍，日本運用宣傳，將自己建構成文明大國的形象，而戰爭也被塑造成落後與文明之戰（鍾淑惠，2015）。

「宣傳」一詞首次使用記載於1622年，隨宗教改革運動，宣傳成為當時招攬人們自願接受教義的方式，到二十世紀，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極權政權使用說服策略，不僅被廣泛使用，也使得被定義成「散布偏見、想法、謠言」等，經過學著們研究而意識到，「宣傳」不是只有「邪惡」(evil)跟極權，亦有正面意義，定義從而演變成，運用符號、形象及心理，產生「建議」(Suggestion)及「影響」(influence)，最終目的就是要讓被宣傳者，為我族類(Pratkanis, & Aronson, 2001: 8)。

宣傳有時被認為是一種「說服」(persuasion)，但其實是有所不同，以往的「說服」是因為掌握文字解釋權力在領導者手上，而成為單向的從統治者到民眾，隨著時代演變，變成對主題的正反意見的辯論，甚至出現「詭辯」(sophistry)等帶有欺騙(trickery)及謬誤論證(fallacious argumentation)的狀況(Pratkanis, & Aronson, 2001: 9)，比較之下「宣傳」目的在讓對方認同，在得到共鳴，因此也帶有心戰意味。

參、形象與心戰

心理戰是軍事行動中，政治作戰的一環，也是戰爭中不可獲缺的一部分(Linebarger, 2010: 37)，而對於心理戰研究的趨勢，已經不再是

需不需要心理戰，而是如何使心理戰更精進，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軍在情報部門下設立的心理作戰組，就是以印製心理戰傳單作為媒介工具，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傳播的工具演變成無線電、擴音系統等(Barnett & Lord, 1989: 46)。由此可見心理作戰在運作上，離不開利用圖像、文字的範疇，主要也是在敵人心中產生出某種形象。

心理戰除了攻勢的行動外，另外也有守勢的心戰(亦稱心防)，而守勢心戰的對象則是對內凝聚民族力量及強化精神戰力，運用的媒介仍是圖像及語文，只是對象上的差異，而論及形象與精神力量方面的關係，在學術界又以傅柯的理論為主流。

一、傅柯論述形象與空間的作用

傅柯曾對療養院的醫生與病人來做論述，療養院是十八世紀對監禁制度改變下的產物，不同以往用嚴刑峻罰的方式，對犯人的身體做出傷害，相對而言監禁較符合人道考量，因此當時的療養院有著人道進步的象徵。

傅柯開始從形象及空間做論述，是從醫生進入療養院開始，醫生與病人便在療養院的環境下產生了一種權力關係，這樣的關係傅柯認為一開始並非是病人體會到醫生所具備的醫療專業，反而是藉由對醫生的認知，包含白色醫袍、崇高道德形象及當下環境所產生，也因此產生了權力上的關係，形象造成的功能凌駕於科學的認知上，而之後的醫療的行為也是透由這樣的形象產生的權威基礎進行(Smart, 1985: 16-17)，也就是說往往在對於形象的感受，先於實際的接觸，而這樣的感受也便形成了權力關係。

二、規訓與懲罰

在形象與權力的形成中，傅柯所提的「規訓與懲罰」有更進一步的說明，從敞視監獄的說明開始，這是法國思想家邊沁

(Jeremy Bentham)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形同在一座環狀的監獄內，中心豎立一的高塔，監視者在高塔上監視著在監獄中的每一個囚犯，由於環狀帶中的每間囚房面對著高塔，而另一面的牆上開了一扇窗，因此牢內的犯人僅看的到高塔，卻看不到高塔上面是否存在著正在看著他的監視者。因此犯人的精神就被限制住了，進而達到規訓的作用。

而這種監獄的規訓效果，傅柯認為這與軍隊也相似，因為軍隊也是利用制式的日常規定，包含早點名、升旗、用餐、操課、訓練等，就像監獄給犯人剝奪自由的懲罰，即便不同十八世紀歐洲君王直接對犯人身體的刑罰，但強迫勞動、無性生活、限制自由等等依舊是對身體施加的痛苦，如同由身體的懲罰轉成對心理方面的懲罰(Smart, 1985: 67)，監獄造成精神方面的約束，形成他們犯罪的代價，也因此抑制了犯人再犯錯的思想，此時靈魂反而變成了囚禁身體的監獄。

三、守勢心戰對內的想像

守勢心戰中，凝聚民族力量是形成抗敵意志的關鍵，而「想像」也可以是民族形成共同體的方式，在幾乎是以視覺與聽覺組成的世界中，「想像」便在文字、詩歌、圖畫及當代的文宣中被建構而成，如同教堂裡的浮雕與彩色玻璃，帶給人的神聖想像；無名戰士紀念碑與墓園成了民族主義的想像；文字的敘述在讀者心中創建民族的共同想像體等（吳叡人（譯），1999：47-60）。

想像的共同體常常被用討論民族的形成，而民族是什麼？安德森認為民族、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的文化人造物」（吳叡人（譯），1999：12），也是一種擁有主權，本質上有限的想像政治共同體，藉由想像產生一種集體認知。而之所以民族可以被想像，

並非憑空捏造，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以德國哲學家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同質、空洞的時間」(homogeneous, empty time)概念，去論證了「想像的共同體」是一種社會事實，在同一個社會中的人，因為擁有「同質、空洞的時間」的意識，即便是不同身分的人，仍會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形成某種集體意識。

而「同質、空洞的時間」所要表達的概念是一種「與此同時」的註解，由於人們身處於同一個社會中，即便人們相互間不相識，但仍是存在著關聯，並且在印刷資本主義下，更使得想像成為可能。當民族的想像形成後，那將是使人民無私奉獻、前仆後繼的宿命感，就像是感受到一個無私的大我與群體的生命，而產生民族宿命感(吳叡人(譯)，1999：17)。

而軍隊作為一個被設定，為國家犧牲奉獻的族群，雖然成員來自不同的地區、背景，但都被要求與訓練，成為思想與信念與團體一致，並且在僅能獲取官方媒播傳播資訊的環境下，即便不同駐地的軍人，也能知道彼此對於國家的認知，也就是整個團體就如同一個人一般，從而在精神方面統合出有效戰力。

第二節 「九二海戰」精神戰力分析

依照大部分史料，沱江艦在當時應該是屬於單艦與敵艦近距離戰鬥，故在戰術上難以有所發揮，因此致勝的關鍵除了平時訓練所培養的戰技(即對裝備的熟練程度)外，所需依靠的就是精神戰力，而精神戰力的定義又為何？從西方軍事思想上來看，克勞賽維茲所著的「戰爭論」中，強調「精神諸力是士氣的泉源，而士氣又是精神諸力綜合表現」，再者，美國艾森豪將軍曾說：「任何種類戰爭的勝利，士氣乃

為一決定的因素」，也就是精神戰力為勝利的關鍵(王榮川等作，2009)。

而我國對精神戰力的認知亦是如此，在《國軍教戰守則》第五條，即明確的說明精神戰力是戰爭決勝因素，在複雜的戰爭環境中，唯有發揮智慧、勇氣及堅強的精神力才能克服，並可藉由無形的精神戰力，來發揮有形戰力，達到以寡擊眾。

以寡擊眾正是「九二海戰」中，沱江艦所發揮的精神，因此軍方學術月刊幾乎以此，做為精神戰力層面的分析，例如我國海軍少校卜耀宗(2011)認為「九二海戰」參戰官兵之精神戰力，是來自於平時的精實訓練與愛國情操，並且艦長指揮得當，與友艦分進合擊、以寡擊眾，官兵前仆後繼，英勇無懼亦是致勝因素，而許世宗(2015)少校進一步認為「九二海戰」能形塑海軍精神之價值，包含以寡擊眾、冒險犯難及同舟共濟等方面，並且要強化精神戰力，靠的是武德的教育培養，去激發榮譽及認同感，是種無形的戰力。

而如何激發認同感，我國的國防報告書中，對於精神戰力的實際作為，亦有充分描述，《104年國防報告書》中，強調精神戰力是「軟實力」與「巧實力」的具體展現，也就是運用電台、網路、報紙、電視節目等宣傳，以及舉辦各種宣傳活動等方式，形塑精神戰力；而《106年國防報告書》中對於精神戰力的厚植，便是要利用各種教育時機及與時俱進的多元宣傳，運用媒體達到戰略溝通，主要獲得民眾及國際社會認同；最新《108年國防報告書》則是在精神戰力方面，相較以往多了要運用新型態傳播平臺，闡釋政策來強化防衛決心及凝聚全民共識，基本上，主軸均離不開對於意志上的認同；另外，在《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中，亦公布了發揮整體精神戰力的願景，主要以建構全民國防、堅定作戰意志、嚴密杜絕滲透、強化戰略溝通等為發展方向，使在作戰時發揮整體戰力。

精神戰力一直被認為是影響軍隊作戰的關鍵之一，從我國的文獻中，可以了解「九二海戰」對海軍的精神戰力，如同陸軍的「黃埔精神」及空軍的「笕橋精神」一般，然而這些精神所對應的戰史，經常受到學術上的考證，而發現虛報的情況，其實戰況敘述的落差並非以訛傳訛，前參謀總長賴名湯（2016：9-10）上將便在日記中，敘述了民國 56 年 1 月 13 日，國共發生的空戰，我方在維護民心士氣的考量下，最終隱瞞戰損且虛報戰功，成為二比零的勝利大捷，空軍既然如此，那海軍會不會有此等狀況呢？

第三節 兩岸眼中的「九二海戰」

我國對於「九二海戰」的研究，相對在海戰的領域中並不普及，多為軍中的學術期刊或戰史紀錄中，僅少數以專書紀錄此海上戰役，畢竟海上作戰與陸上、空中作戰有相當大的不同，陸上及空中作戰死傷易見，但是海上作戰如果失利沈沒後，除了參戰人員之外其他人無從得知，如果加上夜晚海上能見度受限制，要還原戰史更是困難，因此也容易產生文獻上內容有所差異，另外加上政治立場不同，中共對於此戰役的文獻內容與我國不同也很容易理解。本篇將就中共與我方的文獻，探討對於此戰役的論述。

壹、雙方戰力比較

海軍作戰受影響的因素相當廣泛，在政策、態勢、戰法、準備及士氣等均有關係，不單僅是考量艦艇數量、火炮射程及噸位大小，為了解當時雙方戰力狀況，故先以我方檢討與中共海戰之史料，了解雙方海軍軍力態勢，再了解雙方參戰兵力之能力，得以獲得整體概念，以下均摘自「海軍歷次海戰經過檢討報告」（海軍總部，1968 年 6 月 1 日）。

一、雙方海軍狀況

(一) 政策方面

1. 匪軍：能自行建造小型艦艇，以「飛、潛、快」為建軍政策，海上以游擊戰術為主要發展方向，由於快艇偵蒐能力有限，因此強調以岸置雷達站導引快艇作戰。
2. 我軍：由於軍工產業能力不足，仰賴於美援建軍及盟國援助，因此缺乏完整政策目標，甚至影響戰略及戰術發展。

(二) 態勢方面

1. 匪軍：快艇體積小，屬於近岸兵力，在海岸地區易利用地形島嶼實施偷襲伏擊。由於造價低，數量多，足以消耗我戰力，但難以快艇造成全面威脅。
2. 我軍：任務繁重，活動範圍受限，動態容易遭敵掌握，且敵暗我明，主動權在敵。

(三) 戰法方面

1. 匪軍：將快艇隱密於港灣島嶼，利用暗夜襲擊，以岸置雷達掌握水面目標，導引快艇集中兵力實施包圍、近戰。
2. 我軍：缺乏協同作戰經驗及系統性之戰術思想，遇敵易各自為戰而遭各個擊破。

(四) 戰技與準備方面

1. 匪軍：快艇航速高，運轉靈活，便於發揮裝備特性，另從某投誠匪登陸艇之所獲資料，判訓練方面踏實，且能針對預想作戰模式反覆演練。
2. 我軍：通信電子裝備老舊，不易掌握敵情；彈藥不足又須保留校閱演習用，影響夜間訓練，造成夜間遇敵時容易倉惶應戰，盲目射擊。

(五) 士氣方面

1. 匪軍：匪官兵年齡平均較年輕，易盲目衝動，傾向於積小勝為大勝，而建立必勝信心。
2. 我軍：常年巡弋，使得備戰觀念淡薄以及修護能量支援不足應付，導致對裝備缺信心。

二、「九二海戰」雙方兵力比較

因此我國海軍當時依照中共可能進犯的兵力部署及態勢，將噸位較大之陽字號及太字號軍艦納編在北部攻擊支隊，以適時支援北區巡邏支隊作戰，對中共東海艦隊主力實施攻擊，而參戰「九二海戰」的南區巡邏支隊則以輕快兵力組成，負責當時南部巡弋及支援運補任務。中共當時缺乏中大型作戰艦，因此參戰的兵力則是以魚雷快艇及砲艇為主，雙方艦艇諸元性能如下（表2-1）。

表 2-1 「九二海戰」敵我雙方參戰兵力比較表

敵我	艦艇	排水量	航速 (節)	武器	尺寸 (長/寬/吃水)
我方	維源艦	標準： 270 噸 滿載： 450 噸	20	3 吋艦砲 40 釐米砲	173 呎 8 吋/ 23 呎 0.5 吋/ 7 呎 1 吋
我方	沱江艦	標準： 270 噸 滿載： 357 噸	16	3 吋艦砲 40 釐米砲 20 釐米砲	173 呎 8 吋/ 23 呎 0.5 吋/ 7 呎 10 吋
我方	柳江艦	標準： 265 噸 滿載： 367 噸	20	3 吋艦砲 40 釐米砲 20 釐米砲	173 呎 8 吋/ 23 呎 6 吋/ 7 呎 1 吋
敵方	魚雷快艇 (共 12 艘)	標準： 19.3 噸 滿載： 22.4 噸	46	455 釐米魚 雷發射管 14.5 釐米雙 聯機槍兩座	63 呎 11 吋/ 12 呎 2 吋/ 3 呎 3 吋
敵方	砲艇 (共 3 艘)	75 噸		37 釐米砲	

資料來源：

- 王榮川等作 (2009)。臺灣戰史彙編-精神戰力之部。桃園：國防大學。
 鄧熹 (2001)。老軍艦的故事。臺北：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王冀成 (1999)。海獵：共和國海戰紀實。北京：西苑出版社。

三、綜合分析

依照雙方武器性能各以艦砲、機砲或魚雷為主，均屬於視距內作戰武器，雖我方噸位大，耐波力強，火力也較優勢，但匪方體積小、數量多且機動性較高，因此雙方在戰鬥上各有優勢。

就參戰艦艇偵蒐能力，應屬我方較優，但作戰海域靠近大陸時，中共岸置雷達亦較能掌握我方艦艇位置並情傳快艇，總體而言中共快艇因受限於自然環境因素較大，戰力為我方較穩定。

貳、戰役背景與經過

民國 47 年 8 月 23 日，中共對金門發動懲罰性砲擊，企圖封鎖金門地區，為了持續供給金門地區守備物資，海軍制定「閃電計畫」、「鴻運計畫」及「轟雷計畫」目的在執行護航運補任務，8 月 24 日及 27 日於運補任務期間與中共發生海戰軍有死傷。

民國 47 年 9 月 1 日，下午 1617 時，由南巡支隊長姚道義上校率領的維源艦、柳江艦、沱江艦由澎湖啟航，準備護航美堅艦執行金門運補，當時並賦予運載中外記者及重要作戰資料任務，2200 時因支隊抵達金門附近海域，因沱江艦負有另外任務，因此脫離編隊前往指定位置作業，支隊繼續航行，9 月 2 日 0015 時美堅艦於指定地點實施卸載物資，0034 時中共 8 艘艦艇接近，維源艦開始接戰，並令沱江艦掩護美堅號脫離，沱江艦獨自奮戰，擊沉中共魚雷艇 5 艘，重創 2 艘之戰功，直至 0238 時南巡支隊會合後，海戰結束（陳清茂，2018：70-75）。

參、我方文獻論述重點

我國對於此海戰之論述定義為大捷，無論是削弱共艇戰力以及對「八二三戰役」發展，均有關鍵性影響，戰果敘述多以總共擊沉共艇 10 艘，其中沱江艦單艘擊沉共艇數量 5 艘為主，但有發現官方出版文

獻中，同任務的維源與柳江艦，戰果反高於沱江艦的差異狀況（表 2-2）。

在戰損方面，雖中共宣稱擊沉沱江艦，但在事後沱江艦仍開放參觀以及美方曾建議沱江艦進行拆裝停役的史料文件（海軍總部，1958年9月30日），因此中共論述沱江艦在返航途中沉沒，明顯為應為不實資訊。

表 2-2 我國有關「九二海戰」文獻敘述統計

文獻名稱	年份	戰果	戰損	天候
七海雄風	1971	沱江擊沉共艇5艘、傷2艘 總數擊沉共艇10艘、傷2艘	—	海上濃霧 海浪平靜
中華民國 史事紀要 (初稿)	1993	擊沉共艇12艘	某艦艦艙輕 傷、 傷亡10餘人	浮雲蔽月 曾有暴風 雨
八二三台 海戰役	1998	敘述一： 沱江擊沉共艇5艘、傷2艘 總數擊沉共艇10艘、傷2艘 敘述二： 沱江擊沉共艇2艘、傷共 艇1艘 維源與柳江擊沉共艇8艘	陣亡11員	風力3級， 下弦月，霧 氣頗濃，視 界僅200至 400碼
老軍艦的 故事	2001	沱江擊沉共艇5艘、傷2艘	—	
六二特遣 部隊的故 事	2005	總數擊沉共艇11艘、傷2艘		
緬懷九二 一臺海戰 役50周年 紀念專 輯	2008	沱江擊沉共艇5艘、傷2艘 總數擊沉共艇10艘、傷2艘	陣亡11員	9月1日下 午颶風進 入台灣海 上巨浪滔 天
中華民國 海軍軍官 指南	2014	維源、柳江擊沉共艇5艘 總數擊沉共艇10艘、擊2艘	維源及柳江 拖救	
江海歲月 江字號軍 艦的故事	2015	沱江擊沉共艇11艘	—	
鎮海靖疆 左營軍區 的故事	2016	沱江艦擊沉共艇5艘，重 傷2艘 維源、柳江擊退共艇5艘	—	
驚濤艦魂	2017	—	沱江艦失去 動力、陣亡 11員	

資料來源：作者依表內文獻統計。

肆、中共文獻論述重點

中共方面通常稱此戰役為「九一海戰」，綜整各文獻所敘述內容(如表 2-3)多傾向於因颱風，而天候條件不佳的情況下應戰，並檢討誤判攻擊目標等缺失，以至於僅取得部分戰果，即是使沱江艦沉沒。

另外中共論述本身戰損方面，極少敘述被擊沉，多歸咎於天候昏暗及能見度不佳，致使快艇在運轉過程中導航系統失靈，自撞而沉，並也提及落水人員由其他艇救起，整體而言，否定被我方擊沉數十艘的論述；而對本身戰果無法擴大，檢討主要為本身訓練不足及受自然環境影響。

表 2-3 中共有關「九二海戰」文獻敘述統計

文獻名稱	年份	戰果	戰損	天候
福建海防史	1990	沱江艦拖回馬公途中沉沒	兩艘中彈沉沒	5至6級東北風 中浪大湧
金門之戰	1992	沱江艦拖回馬公途中沉沒	兩艘相撞沉沒	起風而湧大浪高
金門紀實 五十年代台海危機始末	1994	沱江艦拖回馬公途中沉沒	兩艘相撞沉沒	風力5至7級
潮漲潮落 國共角逐台灣海峽紀實	1994	沱江艦拖回馬公途中沉沒		
1927-1997世紀 的步伐 中國人民 解放軍全錄	1997	沱江艦於金門外海沉沒		
海獵：共和國海 戰紀實	1999	沱江艦於金門外海沉沒		風力6、7級以上
中國人民解放軍 全史	2000	沱江艦於金門外海沉沒		
雄風-中國人民 海軍紀實	2007	沱江艦拖回馬公，後續報廢	兩艘相撞沉沒	風力7級
新中國海戰檔案	2007	沱江艦拖回馬公，後續報廢	兩艘相撞沉沒	風力7至9級
中國戰典	2008	沱江艦拖回馬公途中沉沒	自撞兩艘沉沒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統計

伍、國共資料差異比較

經過文獻檢閱，雙方國內文獻均各自均稍有落差，但對比國共雙方資料則差異明顯較大。

一、天候方面

中共對於天候描述傾向於因颱風後影響，浪湧較差，塑造出不利於小型艦艇航行的場景。我方敘述海象良好，但能見度較不足，似乎塑造詭譎不易發現中共小型艦艇的敘事。

經查中央氣象局的颱風資料庫，當時的確有一個名為「葛瑞絲」的強烈颱風，雖未登陸但卻造成北部地區許多傷亡，從颱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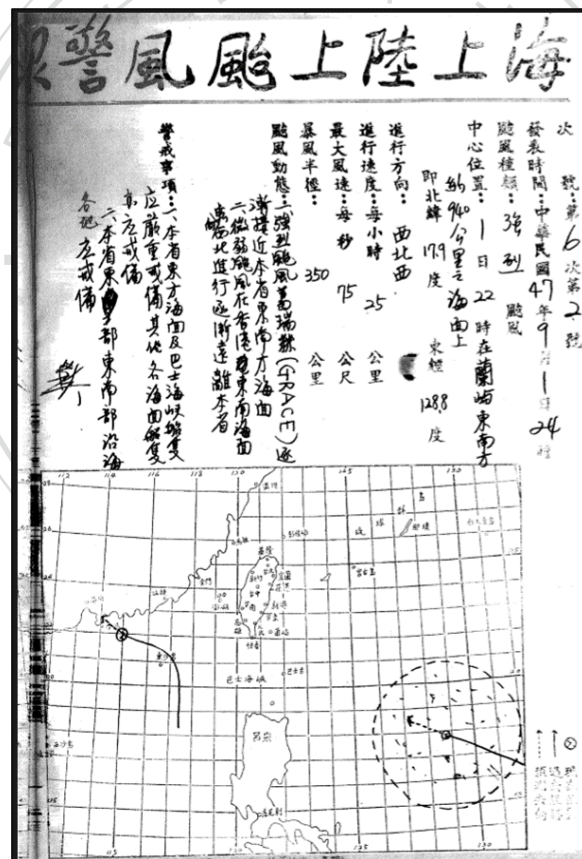


圖 2-2 「葛瑞絲」颱風警報單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庫

歷史路徑圖（圖 2-2）觀察，海戰當下的颱風中心位置在蘭嶼東南方距離約 940 公里的海面上，7 級暴風半徑 350 公里，以每小時 25 公

里速度朝西北西方向前進，而最後經過基隆北部海面，由溫州南方登陸大陸¹；另外圖上在香港附近有微弱颱風向西北進行，但無其他相關資料，因資料庫僅就對臺灣有影響之颱風記錄，研判此微弱颱風當時應該對我影響不大。

因此，筆者研判發生海戰地點當時距離7級暴風半徑仍有550公里，雖說可能有影響，但應尚在7級以下，另外從沱江艦被拖帶的照片中海面也未有浪花，依筆者經驗，海象當下可能在5級(含)以下，反觀中共論述當時海象7至9級，則明顯誇大。

二、戰果與戰損比較

(一) 我國：宣稱擊沉共 11 艘中共艦船，幾近全滅，但中共承認沉沒 2 艘，且為因為天候因素，自撞而沉沒。

(二) 中共：宣稱擊沉沱江艦，實際沱江艦拖帶回國，但經考量修復價值後，決定除役。

三、戰後宣傳

戰後雙方論述均有差異(表2-4)，我方以「以寡擊眾」方式揚所獲戰功；共軍以少數「以小博大」，論述重挫我沱江艦。

表 2-4 九二海戰」雙方敘述差異比較表

項目	天候	參戰艦艇	戰果	戰損	戰後宣傳
我國宣稱	風力3級 能見度 200至400 碼	維源艦(400多噸) 沱江艦、柳江艦 (300多噸)	擊沉中共 魚雷艇8 艘、砲艇3 艘	沱江艦重 傷，陣亡 官兵11員	以寡擊眾
中共宣稱	風力7至9 級	魚雷快艇6艘 砲艇7艘(75噸、50 噸)	擊沉沱江 艦或重創 報廢	魚雷艇2 艘自撞沉 沒	以小博大

資料來源：作者依前揭文獻歸納

從兩岸各方文獻，都可以看出彼此對海戰的敘述都有落差，海上

¹ 依據中央氣象局公開資訊，當時金門尚未建置氣象站，故無作戰海域資訊。「葛瑞斯」颱風海上警報發布時間為1958年9月1日12時，取自https://rdc28.cwb.gov.tw/TDB/public/typhoon_detail?typhoon_id=195813。

作戰受限於距離、能見度限制等因素，戰果往往不易評估，在解密的「海軍金門作戰檢討報告」中，也提出「海軍各艦艇每次海戰缺乏佐證資料審核，戰果較制肘……」(總長辦公室，1958年10月1日)，這也應證出戰果往往難以判斷及考證。

而且海戰戰況敘述的落差並非史無前例，例如海軍總司令部曾發令檢討「逍遙灣戰役」有誇大不實情事(海軍總部，1957年12月9日)，以及檢討貢江艦誤擊本軍艦艇後，報告不實戰果(海軍總部，1962年7月11日)。而當時國防部曾於民國47年7月9日，令頒「陸海空軍各部隊捏報戰況防止辦法」，目的在要求三軍戰果均須詳實，海軍亦研擬「海軍戰果處理辦法」，其中重點為必須藉由戰場清理，盡可能獲取照片、海面漂浮物等情報，及戰後人員約談來評斷(海軍總部，1958年8月30日)。

雖然在戰後報導，我方宣稱擄獲敵人兩件救生衣及一頂救生帽，並詳述上面印有號碼及注意事項(〈一年來的海軍輝煌戰果〉，1959)，然而在檢討報告中，因為未能實施海上戰場清理，以致未獲得任何戰利品及俘虜，是檢討報告中之主要缺失(總長辦公室，1958年10月1日)。

筆者依擔任艦長之經驗，認為南巡支隊在啟航前，早已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海戰後，沱江艦需要海上拖船，又是相當耗時且危險之作業，在人員傷亡、動力受損及時間緊迫的情況下，必然以艦艇安全考量優先，相較於戰場蒐找戰利品，更應爭取返港防颱之時效。

最後，戰鬥發生在午夜，能見度受限，使得這場海戰的過程更耐人尋味，如同當年南巡支隊長姚道義上校所述，是一場「看不見的戰爭」。也正因如此，使得中共方面多了需多扭曲事實的空間，就如同不斷的在文獻中創造出，魚雷快艇在惡劣天候下出擊，並擊沉沱江艦的

神話。面對當時戰爭及時代背景需求，以及中共常藉機策反的情況下，宣傳與形象建構成了「九二海戰」後的另一個戰場。



第三章 九二海戰的重要性

本研究認為「九二海戰」除了一般文獻所探討在戰果上的貢獻外，尚具有其他更有深層的功能，特別是在當時士氣低落、中共滲透且期盼反攻的年代，因此如何解釋一場看不見的戰爭，從無形的模糊戰事，轉變成有形的為空前勝利，並建構成提升士氣，堅定信念的力量，避免中共謠言滲透策反，就成了宣傳與形象的研究範疇，本章將就形象相關理論，論述在這兩方面的效果。

因此，首先梳理海戰發生前期，海軍的處境，藉以了解動機來支撐後續論述建構形象的必要性。其次，用巴特對於語言的看法，分析「九二海戰」後所做的各種宣傳及包裝手段，其實所要創造的就是一種「言談」，這種「言談」變成一種自然的權力關係，也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如果出現不依照這「言談」的語言法則，反而會覺得不自然，也就是說將領導者要傳達的意識，透過「九二海戰」後的宣傳、包裝，逐漸成為一般官兵所認知的事項，除了可以統合一致的信念外，也能夠阻擋中共可能從中利用謠言訛語，破壞我軍心團結。

再者，從拉岡對於如何運用想像來建構自我，去探討當時的視野如何開始邁入想像，從而建立起想像中的理想自我，以這樣的理論架構中，可以觀察到我者、他者的身分，以及儀式、典禮及紀念碑所代表的歷史象徵，這些所觸及的是現代理論與當時背景環境的驗證。

第一節 海戰前的士氣評估

梳理國民 38 年國民政府來臺後，海軍面臨的問題，以及直到「九二海戰」前，期間發生過與多足以影響士氣的重大事件，加上民國 44 年、45 年的海軍士氣調查案報告相關報告，可以發現在海軍當時面對士氣低落的嚴重問題，以及對此問題的重視，也可以看出當時在海軍

官兵內心的焦慮，無法得到滿足的生活，而使得一直呈處在對內苦悶、對外難以連結社會的困境，因此可以從這些重大事件及調查報告著手，得知當時的士氣狀況。

壹、海軍士氣調查報告概述

由於士氣調查報告涉及軍隊實力狀況，並且結果呈現也不想理，因此合理理解當時列為機密非公開文件，也更增添內容可信度，從這兩份解密的調查報告可以窺見海戰前的軍心士氣，以下綜整摘要如後：

一、民國 44 年海軍士氣視察總報告

國防部在民國 45 年 1 至 3 月時，針對海軍總部、各司令部、艦隊指揮部、艦艇部隊、軍醫院及第一造艦所等單位，實施士氣調查，並將結果「國防部四十四年度海軍艦艇對士氣視察總報告」呈報總統，此份報告改進情形直到民國 46 年 7 月，仍被總統府追問久未呈覆如何改進，由此可看出具相當難度，以下均為調查報告之重點摘要（總統府，1956 年 5 月 3 日）。

（一）士氣狀態

官兵對於領袖之信仰以及主義之認識為測驗分數較佳項目，但在生活方面缺乏活力，不滿現實，並憂慮個人前途，官兵間缺乏溫暖融洽；在工作方面缺乏信心以及熱忱，偷懶裝病，除了部分敵前艦艇外，多為散漫且消極敷衍。

（二）主要因素

1. 待遇方面：軍民生活懸殊，軍公警待遇不公，官兵待遇微薄，引起「爭出國」及「求享受」之不良風氣。
2. 前途方面：反攻無期，恐無出路。
3. 官兵情感：官兵間互不關懷，敷衍應付；部分台籍新兵不安

於位，相互出現隔閡。

- 4.生活狀況：部分小型艦艇設備簡陋，使得海上執行任務時，出現蔬菜、淡水不足情況；部分官兵困擾於慢性病纏身。
- 5.男女情感：結婚受限制、軍眷生活悲苦。

(三) 士氣測驗統計狀況

此年度測驗評分項目共八項，單項滿分為 100 分，其中「對領袖及主義之信仰、對作戰目標之認識、對反共抗俄戰爭必勝之信心」等三項均在 84 分以上；「對團體榮譽心、對訓練之信心」等兩項，介於 82 至 79 分之間，而「對部隊長之信心、對裝備之信心、學習及工作情緒」等三項，則介於 72 分至 65 分之間，明顯較低。

(四) 問題歸納

經視察後，為解決上述種種狀況，因此當時海軍歸納整理，臚列出其中八項重大問題，作為其改進之依據，分別摘述如後：

1.人事問題

(1)官兵之調動

官、士、兵調動頻繁，以致養成過渡心理，對工作缺乏熱忱，例如：民國 44 年，巡防艦隊各艦士兵調動達 60% 以上，其中某艦民國 44 年調入士兵 63 員，調出士兵 60 員。

(2)士兵出路與士官制度

士兵方面，由於對於體制的失望，即使有榮譽章及年資識別辦法，但仍消除士兵對前途的憂慮，甚至覺得「當兵十年還是兵」，在社會大眾眼中，等於變相的證明了當

兵無前途的說法，在憂慮個人出路情況之下，生活言行也多「失去正常狀態」。

在士官及士兵晉升、分發方面，未作審慎評估與作業，導致在晉升時，發生學識、年資、考績、考試成績較高人員僅晉升較低位階或未晉升，素質低劣人員反而晉升相對較高之位階等不合理狀況，造成人員抱怨不平。

(3)官兵調派出國風氣與後果

由於官兵出國接艦或整修裝備可領相較於國內優渥之津貼，據調查顯示，如士兵出國 10 個月後返國，將結餘兌換臺幣，金額超過萬元，以致造成弊端叢生及人事上紛擾，使得出國人員考核不實、派遣不公，甚至臨時替換，對官兵造成極大影響，產生不安情緒，進而發生人員因無法出國而剖腹、跳海自殺或精神失常等狀況。

(4)私婚問題

在反攻氛圍遙遙無期的情況下，使得官士兵萌生成家打算，但受限於結婚規定，部分軍需文書類別士官兵不准結婚，以至於產生違法私婚情事，甚至不擇手段尋求對向，進而衍生其子女無法申報戶口及受教育等煩惱。

2.編制問題

因各級主官矛盾心理，因官兵素質較差，希望增加編制充實人數，以利戰鬥時人員耗損補充，但卻也抱怨人數太多住艙擁擠，而實際上，扣除老弱病患、新兵及缺員數量，可用人數仍低於原編制人數，實為「量大質弱」，外強中乾。

3.訓練問題

艦艇對於訓練進度，多未能按表實施，形成虛設，相關

訓練成果也敷衍應付，期以掩飾訓練缺點，形成虛報風氣，也影響戰力及信心。另外對於彈藥兵及事務兵，均未從射擊訓練，對於戰鬥時之缺員補充，感到困難。

4. 補給待遇問題

副食費方面，同一單位及環境卻因身分不同而有副食費差異，以及艦艇單位環境較為艱苦，反而副食費較某些高層陸地單位不良，造成心理不平。甚至有大船向小船炫耀菜餚，以致士兵間情感疏遠。

5. 在被服方面

士兵工作服僅一套，又因待遇低無法購置，艦艇出海亦淡水管制，使得換洗困難，列為當時最嚴重問題。在待遇、經費方面，海軍服務總社之盈餘，僅為各級主官之出海加給，形成特殊階級的差別待遇。另外，春節發放有眷官兵福利金，須至指定地點領取，其金額僅 10 元，甚至可能比前往領取所花的交通費還低，成為對官兵精神之一大諷刺；而在公家經費運用方面，發生公費挪為私人應酬或作為補助家用，遭受官兵指責。

6. 修護保養問題

艦艇修護與出國又息息相關，由於官兵傾向出國，因此出現艦艇間相互抱怨出國修艦機會不公，並認為海軍自己艦艇的修護廠能力不足，是靠「以艦養廠」，因此廠艦兩方也時常相互指責，關係不良；廠方工人也因待遇不佳，導致夜間至民營工廠工作，而使得修艦效率不良，造成關係惡性循環。

7. 醫療設備問題

因生活條件困苦，以及人員不良習慣，導致艦艇人員患胃病、肺病、性病等慢性病人數日漸增加，艦艇醫療資源及經費有限，不足應付艦艇需求，而陸上醫院人員又常言語刺激病患，整體而言，有病不能醫，影響士氣及戰力。

8. 碼頭設備問題

海軍艦艇當時以左高碼頭停泊最多，因碼頭無休閒設施，士兵多於酒樓、茶室、彈子所等娛樂場所，但儀態鬆散、紀律散漫，常與女侍公開打情罵俏，損害軍人形象。

另外，碼頭缺乏營舍，對於小型艦如江字號，原本在美軍列為近海巡弋，出海時間短，靠港後即到陸上，營舍休息，因此艦上生活設施相對簡單，但我國運用此型艦，卻擔任較常巡邏任務，因此產生食宿困難問題。

9. 眷屬生活問題

此為待遇微薄衍生之問題，因財力無法負擔家用，又因任務無暇照顧家庭，導致眷屬生活不安定，甚至出現婚變、秘密賣淫等情事，影響士兵心理，曾有因此問題而發生士兵自殺事件。

(五) 結論

從統計資料觀察，雖然戰志高昂，但卻係因生活各方面問題重重，自卑於軍民之間的懸殊，在軍中苦無出路，因此將前途寄託於反攻之上，整體而言，評估如參戰時，將偏激而缺乏持久性。

然而面對上述的八大問題，海軍高層亦提出許多精進作為與檢討方案，但對於士氣的提升狀況，在下一年度的士氣視察中，卻再次呈現下降，因此除了相關政策需時間

推行外，但也透露出積極想改善的急迫性。

二、民國 45 年海軍士氣視察總報告

在民國 46 年 5 月時亦完成民國 45 年的士氣調查，但由於進行方式恐有疏漏，因此決定在民國 46 年 10 月時於左營、高雄、馬公、基隆、淡水等港口同時實施測驗，統計受測共計 5,735 員，是當時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並出具視察報告。

然而在經過針對前年度士氣低落的檢討作為後，士氣低落狀況不僅未提升反而各項士氣測驗統計分數均下降，因此本年度的測驗結果，是著重與前一年度之比較，以下為民國 45 年海軍士氣視察總報告之重點摘要（國防部，1958 年 2 月 7 日）。

（一）士氣狀態

1. 對領袖之信仰

此項分數較前年測驗下降 7.7 分，其中提問受測者「我們是領袖的？」，大多選擇「信徒」，但選擇「部下」也不在少數，但仍是對「要光復大陸必須服從領袖」感到認同，因此報告中解釋，分數下降原因為新兵教育程度不足所致。

2. 對主義之信仰

此項相較去年分數下降原因，歸咎於新兵及文化程度部分較低所致，對於「三民主義之目的與動機」較不明瞭。

3. 對作戰目標之認識

多數戰士均能認知戰爭目標為抗俄殺共，並為拯救同胞及人類自由發展，測驗中因部分士兵未將朱毛（意旨朱德、毛澤東）視為漢奸流寇，而僅認為是共產黨，導致測驗積分降低。

4. 對反共抗俄戰爭之必勝信念

此項仍測驗中分數最高項目，承接前年度之期望，視反攻為希望。

5.對部度長之信心

雖然打罵狀況減少，但仍對部隊長印象不佳而其中又以對總司令的得分最低，在此可看出士兵對於高層長官之疏遠程度。

6.對裝備之信心

此項為分數最低之項目，原因在於評比細項包含比較我軍與匪的裝備、艦艇保養、主副食、服裝及艦艇生活設施，然而其中對於外出服及工作服均表達不足，以及對艦艇生活設施大部分均表示不滿意。

7.對訓練之信心

多數士兵認為實作經驗及訓練不足，對槍砲射擊無信心。

8.學習及工作情緒

由於惰性存在，致使學習風氣不良，工作怠惰。

9.對團體之榮譽心

經內容分析，發現對於團體之榮譽感優於個人。

(二) 主要因素

1.外界影響軍心

在士氣調查報告中，提到受測官兵中，有統計至少 38% 以上的受測者願意退役轉業，又有約 40% 的官兵認為「社會看不起軍人」，由此可看當時軍心之不安。

2.領導統御問題

由於多項指標均與部隊長的領導統御有關，包含對裝

備、訓練的信心，以及學習與工作情緒，可以說是息息相關，因此在部隊長不積極以及弟兄對其信心不高的情況下，團隊的精神隨之下降以及紀律不彰。

3.四大公開不澈底

此點即是呼應蔣介石在演講「說士氣」一文中提到的要「實踐四大公開」，包含人事、經理、賞罰、意見，必須合理、公平及公開，因此海軍也檢討人事與補給勤務處理不良之部分，是造成士兵所不滿的因素。

4.教育和訓練不足

主要敘述士兵因教育訓練不足，導致認識不夠而失去信心，產生思想及行為上之偏差。

(三) 檢討報告結論

總體而言，認定領導統御為中心問題，如果此項改善，則其他問題必能得到緩解，但領導統御問題又牽涉士官兵對於部隊長之信心，而之所以對部隊長信心低落，又係因軍民生活差異太大，無法解決前途及婚姻問題，致使社會地位低落，不滿於現況，即便民人未有侮辱之行為，但自卑慚愧心理卻常存在心中。

貳、綜合分析

基本上，民國 44 年的八大問題，幾乎詳盡描述海軍當時士氣低落因素，然而民國 46 年 9 月 2 日，蔣介石於陸軍指揮參謀學校對學員演講「士氣說」，雖然是對陸軍的演講，但在海軍總司令部所呈的士氣視察報告中，幾乎以「士氣說」內容作為檢討士氣低落之主要因素。

然而海軍的士氣低落因素有其更深遠的歷史因素，因此綜合上述士氣視察內容並探究其影響，即可以從三個面向，重新詮釋海軍士官

兵當時的處境。

一、海軍官兵與外界關係

綜觀海軍對社會之看法，存在，海軍對於外界的心裡是「最大的憎恨，是奢侈淫靡的社會風氣」，並且有至少45%的受測人員認為「社會看不起軍人」，之所以造成這樣的氛圍，與待遇、人事、前途等因素息息相關，也環環相扣。

雖然海軍總司令部了解到待遇為許多問題的根本，但此並非海軍所能解決，再加上反攻氛圍下，國軍部隊人數多，財政難以應付待遇提升，因此蔣介石以「士氣說」講稿，來強調領導統御及精神教育為解決之道，使得一些重大的問題僅治標而未能治本，例如：海軍總司令部針對民國44年的重大問題向國防部建議「航海加給應調整」，但卻遭指示「目前財政困難暫緩調整」，意味著軍人與民人間的差距依舊無法消弭，接續的解決辦法，是在艦艇基地設置康樂中心，且非假日不得離開基地，如果所在港口無康樂中心，則以艦艇錨泊在港中為原則，非假日不得上岸，雖目的在避免士官兵受到社會不良風氣影響，但隔離的作為，反而使得軍人與社會的距離更遠。

二、內部的分裂與不認同

中國的海軍由於地區及學校教育的不同，使得海軍的成員主要區分四個派系，首先是福州馬尾的船政局，俗稱「馬尾海校」，在裡面的學生沿用英國學制，需授業七年半，期間區分前後學堂，前學堂由法國人以法文教導造艦原理，後學堂由英國人以英文教導艦船航行操作，由現代海軍角度來看，可謂是「航輪兼修」，因此在專業上應該是無置可否，當然在身份上也難隱高傲，這些以馬尾學校為主的派系稱為「閩系」，而「閩系」的海軍軍官，平時

以福州話及英文作為主要語言，從外語能力、東西方思想的差異，造成「閩系」海軍的優越感，也成為一個封閉排外的團體。

然而「閩系」海軍也因承接北洋海軍，掌握海軍主要機構，並自喻為「中央海軍」，使得更強化此種菁英思想，阻饒非派系人員任用，也促使其他派系的生成與對立，其中廣東黃埔的「黃埔海校」，號稱為「粵系」，雖然人數不多但仍是佔有一席之地；青島海校的「青島系」，又有「東北系」之稱，對於「閩系」特別反感；第四個是「電雷系」，由1932年蔣介石成立的「電雷學校」所組成，隸屬於軍政部底下，非海軍部所屬，這也造成「閩系」海軍的歧視與不滿（姚開陽，2017：221-227）。

派系不僅存在於從大陸播遷到臺灣前，地域產生的區別，在到臺灣後，雖然地域的派系問題逐漸弱化，但在高階官員的實際運作中仍存有痕跡，而有制衡的現象，而這樣的情況使得在意識上，出現了新舊之分，以至於新、舊海軍之間，仍存有一道鴻溝（總統府，1956年5月3日）。

這些問題存在海軍許久，到了台灣後這樣派系問題依舊延續，當時總司令桂永清上將於民國38年時，以照顧官兵、眷屬，並提供平時休閒場所之名，在海軍的大本營左營軍區，設置了「四海一家」餐廳，在字面上便隱含了消弭派系問題的期待，但派系所引起的身份上認同差異並沒有因此消失，從民國47年6月6日所公布影響士氣因素的改進情形中，仍是以實踐總統訓示「澈底戒免個人主義、本位觀念、派系私見，以樹立公正嚴明之領導作風。」，作為改善領導不適影響團隊的方針，由此看得出派系問題亦為當時總統所關切之事項（國防部，1957年8月17日）。

派系影響到海軍領導統御，除了直觀的人事方面偏見外，其

實與造成的風氣也有關係，由於「閩系」受到西方教育的洗禮，在語言、觀念方面自然跟其他人有差異，並埋下了崇洋風氣的起因，而當時與美國的關係密切，自然語言能力會影響到出國受訓、接艦的機會，對海軍官兵而言，出國是心理第一希望，因為出國的津貼優渥，可以解決經濟問題，但造成這種「依賴」、「崇洋」的風氣，使得部分的人在本務不求精進，反而在人事上找關係、靠關係獲取出國機會，出國後又引發走私問題，及回國後的自負心理，造成人員相互排擠、嫉視，甚至影響到須合作的工作，因此在民國44年的士氣報告中，「爭取出國」被註記為「目前海軍最嚴重之問題」（總統府，1956年5月3日）。

三、海軍基層與高層之間

當時海軍內部的問題，造成軍紀不彰、對前途渺茫、經濟狀況不佳，並且中共在缺乏海軍的情況下，積極趁機策反，使得追隨來臺灣的海軍官兵開始出現叛逃投靠共產黨的狀況，從第一艘在1949年2月叛逃的「黃安艦」開始，整個1949年約有90餘艘，人數約6,000餘人陸續發動叛變（姚開陽，2017：236-237），雖有成功也有失敗，但對士氣無疑是一大打擊。

其中剛於1948年8月份自英國接收回來的巡洋艦「重慶」號，號稱是國內噸位最大、火力最強的戰艦，也於1949年2月時，在鄧兆祥艦長被動接受艦上人員叛變的情況下投向中共，並過了三天後海軍才發現，隨後派遣空軍前往炸沉；以及海防第二艦隊由艦隊司令林遵帶領下，率12艘艦艇執行叛變等事件（姚開陽，2017：82-108），使得海軍在蔣介石總統心中，產生不信任感，也就是海軍得不到總統的認同，如同嬰兒得不到母親認同的眼神一樣。

然而海軍整艘船的叛變並不容易，從筆者在艦艇服役的經驗

而言，整艘船要叛變的難度相當高，因為一艘船出海執行任務需要全體的分工合作，包含航行計畫擬定、裝備油水補充，淡水食品整備，並且船上生活空間狹小，因此想要執行叛變除非全船意見相左不大，否則就像1949年9月份「美頌」艦叛變事件，因艦長毛卻非錯判艦上官兵意願及開會宣布即將起義，因此反被其他人制壓而失敗；及1949年5月份「永興」艦叛變事件，於航行時航海官及文書官趁機挾持艦長陸維源，威脅開往投共，而陸艦長抵死不從犧牲成仁，使得其他官兵群起反抗，阻止叛變成功（姚開陽，2017：153-186）。

因此對於叛變的艦船而言，是「起義」或是「叛變」，是「投共」或是「投誠」都只是立場的問題，由於缺乏對海軍的自我認同感，經濟、地位、前途才是考量的因素，就像嬰兒在自我形成以前，是以自己看到、聽到及感受到做為一切，只遵循著生命的本能，尋求著適合自己的生存方式發展（姚開陽，2017：234）。

叛艦所引發的後果是深遠的，特別是促使「海軍白色恐怖」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之所以會描述為「海軍白色恐怖」也正是因為在民國38年的時候，臺灣社會正處於因國民政府執行威權統治並實施戒嚴，使得許多政治立場不同者遭情治單位整肅迫害，因此提到「臺灣白色恐怖」都會使人聯想到剷除異己、冤獄、匪諜等事件，而在海軍也有共產黨滲入策反投共，面對派系、艦艇叛逃等種種問題，蔣介石總統決定重用自己的親信桂永清上將擔任海軍總司令，想藉此整肅海軍。

艦船的叛逃使得與其有關人員，甚至與叛逃艦同型的艦船，都被認為因具有相關背景因素，而成為懷疑或整肅對象，所包含的階節從上校到學生，例如「永興」艦叛逃案的主謀，因被發現

與同學密謀策反，因此整個年班都成了調查對象；另外，也不乏有因為派系鬥爭，進而利用裁賦手段使對手蒙冤入獄的案例，或是利用假消息試探忠誠度的情形，總體而言，只要與共產黨有相關，都有可能在寧可錯殺一百也不願放過一個的氛圍下鋸鐺入獄甚至遭槍決（姚開陽，2017：221-235）。

另高層與基層間的不信任，也延續在人事調整中，出現類似氛圍，例如民國44年的海軍士氣報告中，敘述出此項問題的嚴重性，如在檢討出國官兵調派這方面，其中一項為在派遣艦艇出國前，經常因考核未盡適當或對人員的疑慮，而臨時調動艦上的官兵，造成艦艇單位人員惶恐，甚至產生個人神經失常、自殺暴行，例如：報告中敘述某艦在啟航往國外前，總部突然撤換輪機長，因為輪機長為船上裝備維修的主要核心主管，因此造成全艦官兵惶恐不安；某艦某員於該艦出國前被調職，進而切腹自殺；某艦下士於該艦出國前兩小時調職，受刺激精神失常。海軍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士氣低落似乎已經是整個海軍基層的整體氛圍，甚至讓高層不得不意識到這種狀況（國防部，1957年8月12日）。

對於蔣介石而言，反攻大陸的理想尚未完成，退守海島臺灣的軍隊，仍需要海軍才能完成此大業，並且認為士氣與精神是國民革命軍，以寡擊眾、以弱擊強，完成反攻任務最有利武器，因此面對士氣低迷情況，理所當然的希望改善此風氣，因此從民國47年4月1日國防部令頒全軍的光華會議第一案之內容中，指出幹部應該給予部屬的觀念為「個人一切問題，只有在反攻大陸勝利後尋求總的解決」以及「一切痛苦，都是由於敵人竊取大陸所造成，對社會憤恨、長官不滿……，惟有仇恨敵人，進而消滅敵人，才是真正發洩怨恨的對象……」等重要觀念（國防部，1958年3月

20日)，此時成為開始重建「他者」形象的重要契機。

在這之前，雖然以往當時我國對共軍的稱呼必冠上「匪」字，且我海軍對共軍海軍亦是如此，但「他者」是否存在？回顧中共在1949年4月23日，以林遵率海防第二艦隊叛變投共，當作其海軍建軍日期，然而即便宣布成軍，仍因缺乏空軍防護，因此叛逃的艦艇必須躲在大陸港口內，以避免被國民政府空軍所擊沉（姚開陽，2017：87-88）；而中共其餘的小型快艇兵力，雖然海軍也視快艇為威脅，但畢竟快艇與我國海軍艦艇噸位相差大，因此並不認為是對手，故筆者認為「他者」的形象並不存在。

最後，綜合整體士氣報告的描述，筆者認為這段期間，海軍如同像初生離開母親的嬰兒，派系的分裂是讓海軍感到主體的不完全；同袍的叛變使得對於自身認同是混淆的；被高層所不信任下的白色恐怖如同得不到其他人眼光的認同；被社會所排擠感受到的是一種歧視，總體而言，在生活條件困苦、觀念偏差的環境，需要的是要一個足以成為精神戰力的轉捩點。

第二節 需要形象的時代

從前一節的敘述可以了解到，海軍士氣低落原因，且當時政策無法立即解決困境，因此筆者認為「九二海戰」所創造的言談及形象作用，對於當時偏差的風氣與觀念，有導正作用，對比作戰功勞是有過之無不及，而這種作用的產生可以從巴特的思想去分析。

壹、「九二海戰」的角色

軍隊雖然由不同的個體所組成，但因擁有武力且擔負國家安全的責任，必須能拋開個人情感與想法執行任務，所以雖說是群體，但被要求的是唯一信念，如同單一個體一般。

領導者對於軍隊的期待也是如此，然而從前章所述「九二海戰」的過程畢竟難以具體呈現，也容易陷入敵人的的扭曲論述，因此創造出一種「言談」反而是符合對於軍隊的期待，在成為「言談」的過程中，原本的實際的作戰過程已經不在是需要多做解釋的項目，利用了各種照片、頒獎、紀念儀式以及建造紀念塔等，在勝利才會出現的素材，詮釋了受到重創被拖帶回來的意義，在海軍的環境中，看似自然的認知，卻是一種意識的潛藏。

另外，巴特在觀察社會現象的時候，注意到了人們對於觀看拳擊與摔角比賽的眼光不同，拳擊比賽中觀眾期待的是實力較量的結果，選手不必迎合觀眾的期待而表演，目的就是為了擊敗對手；而摔角選手的功能卻與拳擊選手不同，是趨向於表現出符合觀眾期待的動作及姿勢，在其中的觀眾要的是激情的形象，整體展現出的是受到苦難，經由挫敗，最後獲得正義的場景，而且如果觀眾對於手表現的太過真實，反而無法接受，認為太形式化(Barthes, 1972:15-22)；對比「九二海戰」在宣傳的過程中，似乎也看到這樣的縮影，宣傳的內容不是要求在精準的擊沉數量上（即便中共露出的訊息也不一定真實），轉而建立的是即便海軍生活條件苦難，在經過以寡擊眾的海戰後，仍能夠正義歸來的勝利。加上長久以來，中共在我軍眼中是為「匪軍」，因此我方更具有道德角色的形象塑造，讓這場戰鬥更具有意指作用。

貳、「九二海戰」的意指作用及去政治化

意指作用就是一種言談，「九二海戰」的意指作用，其實就是指在這宣傳中，產生了許多符號間的關係，從一開始的「能指」指的是聲音或是語詞，結合「所指」也就是概念，所成為第一系統的符號，再將此符號作為第二系統的能指，在「九二海戰」中的許多言談中，都可以發現，其中包含許多意指作用，例如以海軍頒給沱江艦的「虎旗」

做分析，「虎旗」在第一系統中，「能指」即是一面繡有老虎的旗幟，而「所指」就是國軍賦予部隊榮譽的概念，當這面榮譽「虎旗」成為第二系統的能指時，再被賦予英雄勝利的概念，最終形成的意指作用，其他對於海戰的「勳績詞」、「紀念碑」等，也都是具有「九二海戰」的意指作用，使得勝利表現在各個慶祝、獎勵及紀念會中，相對也是對海戰有存疑的人回應，也完成了將其自然正當化。

當形成自然的言談時，相對的也形成了去政治化，這意思並不是隱藏或是除去了政治意圖，而是將其變得自然，最終依舊能達成政治目的，而筆者認為當時的政治目的，即是要官兵以「台海精神」為行為標準。雖然巴特認為人們不應該認為要自然的接受這種潛藏的意識形態，但筆者認為軍人畢竟身分特殊，非一般民眾，在敵人面前如果信念未統一，何來整合戰力，因此筆者認為這些符號的建構過程，有其必要性。

第三節 建立理想的形象

要了解如何以拉岡的角度，解釋海軍的自我建構，可以從他的 L 圖式（圖 3-1）中做出分析，圖中”S”是主體的所在位置，如同海軍官兵本身，而主體言說的對象則是代表象徵秩序的大寫他者”A”，也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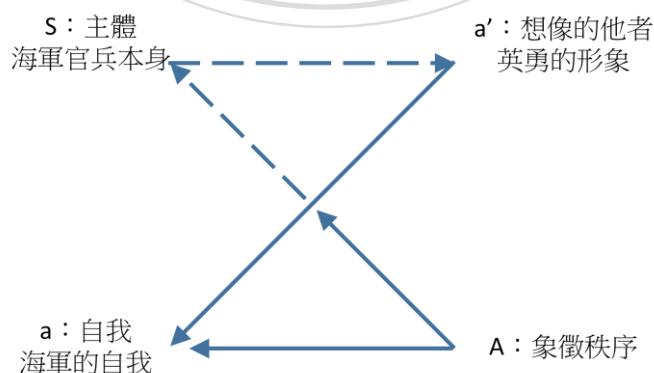


圖 3-1 從拉岡的「L 圖示」對照海軍自我建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指」的場域及語言發生的場所，也代表象徵界他人主體的位置，用此來開始分析「九二海戰」中的自我建構圖。

當主體”S”試圖向大寫他者”A”言說時，這個言說拉岡描述就像嬰兒對外發聲，目的就是引起大他者的回應，由於想樣的移情作用，所以投向的是海軍官兵想像中的他人形象，也就是小寫他者”a”的位置，而從”a’→a”是一條想像軸，因此這個言說沿著想像軸到達”a”自我的位置，因此是以實線相連的想像軸，這也顯示海軍的官兵陷入想像的自言自語中，並逐漸認同這個想像的小寫”a”，也同時建構自我，而大他者”A”對於主體”S”的話語，也會因為這想像軸而產生干擾(Evans, 2006: 172-174)。

因此從拉岡的理論，要藉由這種認同一個在我以外的理想形象，才能克服先前所面對的挫折，做到原本做不到的事，(Leader, 2014: 21)，因此鏡像中「他者」的出現成為海軍建立自我的一個重要節點。

壹、他者的形成

拉岡提到的「他者」區分大寫的「他者」與小寫的「他者」，其中小寫的「他者」並不是真正的「他者」，而是「自我」(EGO)的反映與投射，同時是分身也是鏡像，完全處於想像層之中，因此那是一個想像出來的「他者」(Evans, 2006: 135-136)。隨著當時國共間的海上衝突逐漸增加，我方艦艇也開始有損失，並伴隨著海軍士氣的持續低落之際，中共引發第二次台海危機，發動「八二三」砲戰，在政策的催化之下，海軍需要的是士氣，也就是「九二海戰」發生後，而海軍在海戰後所建構的「他者」，即是一個英勇國軍擊滅中共的英雄想像。

從在一些文獻及文宣中，對於我沱江艦如何抗擊中共魚雷快艇的描述，例如「匪魚雷快艇四處竄逃」、「就是來送死的」(〈料羅灣海戰記——南巡支隊痛殲十二匪艇〉, 1958)，其中「匪」即帶有我正敵邪

意味，利用「逃竄、送死」等語句，突顯出我強敵弱之概念；另外，對於自己的描述，也隱含著許多象徵的意義，例如：

一、前仆後繼的勇敢

戰鬥過程中，沱江艦不斷遭受中共砲火，其中主砲在砲長、射手負傷後，由接殼手理髮一兵董烈士接替射擊，續遭匪彈擊中成仁；21砲射手張烈士遭匪擊傷成仁後，由裝彈手蔡烈士接替射擊，續也遭匪彈擊中，代表即便砲火猛烈，幹部負傷下，士兵依舊無懼接替，這也形同破除了在海軍官兵在士氣調查報告中，關於「彈藥兵及事務兵，均未受射擊訓練，戰時缺員之補充，將感困難」的重大問題（國防部，1957年8月12日）。

二、訓練扎實的射擊

回顧當年對戰役過程的報導，艦艇射擊的成效是實質對戰果的呈現，因此有報導呈現敘述「我艦大小槍砲也一齊集中射擊，雷達...在這機近的距離已失去效果，全憑目力射擊，此時的月亮好像也特別起勁.....一艘艘打的起火爆炸。」(常勝君，1958)，依筆者經驗水面射擊在有雷達輔助的情況下，要命中目標已經具有難度，何況是沒有雷達輔助，更是又發生在夜間，但這卻能夠給其他海軍弟兄帶來具象徵性意義，從士氣調查報告中「對裝備之信心」部分，有呈現出士兵因實習機會較低，感覺訓練不扎實，對槍砲命中率擔心，因此這方面的宣傳報導，似乎有激勵作用。

貳、建構的理想自我

從「九二海戰」的戰後宣傳，描述出沱江艦為了掩護美堅艦而獨自衝入敵船隊奮勇殺敵的經過，運用拉岡的「鏡像階段」理論進行解讀，可以得到鏡像建立了主角沱江艦與敵人之間想像的關係，也就是把自己想像成為「他者」，在藉由這個「他者」來指認自己。

海軍官兵對於「九二海戰」的迷戀其實是投射在「沱江艦」身上的理想自我迷戀。需要思考的是，拉岡的「鏡像階段」理論是建立自我以及自我認同的哲學隱喻，並非單純指像現實中嬰兒照鏡子的過程。並且，理論中嬰兒認為破碎的身體，也並非現實物理上的意義，而是指身心方面的不完善，就像海軍對自己的評估是「士氣似旺盛而欠正常」(國防部，1957年8月12日)，其中的不正常就是指在價值觀與自我認知方面。因此，需要有了這「認同」(identifies)的概念。

而對鏡像的認同，也是認同這個理想的自我，甚至可以說是自戀，並且想像的過程伴隨著快樂。然而，這種完整的感覺卻與自身的體驗有落差的，也就是，即使在想像著與沱江艦一樣的光榮，但現實在軍中的生活並未改變(或說已經在改變中)，因此仍然會感到自己的不完善，但是也就是這個形象，提供了一種完整感。這種認同是相當重要，如果沒有這個過程，那將無法達到完善的狀態，但是這也是一種「異化」，海軍官兵的自我認同便在異化與自戀中出現，這也是拉岡所堅持的，自我是建立在整體性與虛幻的基礎上，換句話說，自我的功能就是一種「誤識」(mis-recognition)，用此來消除海軍官兵所感到的異化與主體感到的不完美(Homer, 2004: 25-26)。

海軍的官兵是如何進入想像過程呢?從拉岡的理論運用在電影中的論述，當觀眾凝視(gaze)著電影螢幕時，其實凝視著是一種自我的想像，因此螢幕前的觀眾，就像照著鏡子的嬰兒感到高興，並尋求著對自我的認同，把自己的欲望投射到影片中的角色(Homer, 2004: 27-29)。

而對比在軍中的生活，往往典禮、儀式、集合便是強迫官兵在會場，注視著這一個場景的進行，如同在電影院中的凝視一般，以這場戰役的宣傳為例，海軍為這場海戰舉的慶功典禮，一開始沱江艦這類型的江字型艦，給海軍官兵的印象，就是認為這是生活條件最艱辛的

這型船，並開始聯想到艦體小，編制大，鋪位不足，可能晚上要到官廳或甲板打地鋪，海上顛頗生活困苦，官兵多視為地獄，甚至會用此作為威脅士兵，如「再調皮調你到江字號」(國防部，1957年8月12日)，這些條件象徵著一群和一般海軍官兵一樣生活困苦，喚起不少苦難同感以及認為次等於大型軍艦的情感。這「江字型艦」的象徵意義在一開始就帶領其他的海軍官兵進入想像界當中，就是他跟我一樣，我就是他，接著把其他人帶入沱江艦這個主角中，開始進行種種的想像，例如遇敵不退、浴血奮戰等。

雖然官兵知道沱江艦的生活條件不好，也聽到一開始「九二海戰」面對以寡擊眾的局面，及作戰過程艱辛，前仆後繼的陣亡，醫官臨終不忘弟兄傷勢，還有沱江艦持續進水艦艙半沉，官兵擔心沉船無不努力搶救等慘烈經過，但憑著對慶功大會的認知，其實在底下的官兵都像是在戲院中的觀眾一樣知道結局，知道戰役的最後終究是會逆轉頹勢，當然最後如大家所願的平安靠港，接受英雄般的儀式。

慶功大會中的官兵將自己對「反攻大陸、消滅萬惡共匪」的慾望全部投射在「九二海戰」中的沱江艦，從長官委以重任，到如臨大敵挺身而出，再到浴血奮戰片甲不留，最後任務成功光榮歸來，透過這一場敘事，讓所有海軍官兵走進了想像層，幻想著自己就是那位英勇的艦長、那位勇敢的砲手、那位不放棄的堵漏人員，沱江艦成了大家鏡中的影像，使全體得到了滿足。

從這裡可以回顧「九二海戰」的「鏡像階段」，其實實際上在戰鬥過程中敵人是誰?是多是寡?已經不是重點，甚至在漆黑的海面上，已無法知道對方是誰，如同主體無法得知大他者一般，因為理想的自己是靠自己所想像，無關他者實際狀況，因此可以看見，不同的文宣上對於戰果的描述總有些差異，而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建立起鏡像的自

我，以及如何以象徵在結構關係中流動，才是海軍高層應該思考的關鍵。



第四章 建立勝利形象

士氣是作戰勝利的關鍵之一，作戰過程中常運用心理戰，對內可以提升自己國家的士氣，並對外削弱敵人的士氣，而心理戰往往也與宣傳密不可分(Edward L. Bernays, 1942)，因此可以看到當時在台海戰役期間，宣傳也是政策的指導之一。

從民國 47 年 9 月 18 日，由國防部呈總統的「激勵金馬守軍士氣辦法要點」簽呈中，可以整理出致力於對內宣傳的幾個工作項目（總統府，1958 年 10 月 16 日）：

- 一、精神動員方面：舉行「迎接戰鬥爭取首功」、擴大表揚立功事蹟。
- 二、組織運用方面：利用克難（戰鬥）英雄帶頭示範、選拔戰鬥英雄。
- 三、加強康樂方面：製作雄壯激昂軍歌印發全國軍民傳唱及電台廣播。
- 四、宣傳激勵方面：指示「發動各報刊盡量刊載激勵士氣之各項新聞」。

這些豐富的宣傳手段，更說明了宣傳的多元性，可以涵蓋符號、修辭、圖像、音樂等，目的就是為了要取得輿論的話語權(Scriver, 2015)。「九二海戰」正是在國軍積極實施宣傳，許多戰後的戰功敘述、佳麗慰勉、長官表揚等事件，透過照片及文宣傳達到社會及軍中，彌補了海戰過程難以實際影像紀錄的先天限制，也使得照片與語言間的相互關係，發展出了故事。

第一節 彈孔、鋼盔的隱喻

在「九二海戰」的照片中，不乏看到彈孔及受損的照片，戰爭造成的傷害與破壞是無可避免的，而這些遭到敵人攻擊後的影像，對於觀看者的影響，除了讓人感受到生存的恐懼外，也能引發同袍更具激烈的心理，就像是同仇敵愾一般(Vail, Arndt, Motyl, & Pyszczyński, 2012)，由照片強調這些傷損的位置與狀況，將更容易激勵士氣。

壹、射穿的鋼盔

鋼盔，是國家賦予軍人保護自己的裝備，雖然鋼盔無法抵擋子彈的正面貫穿，但這仍舊是軍人無法被取代的配備，筆者試著從形象方面，解讀鋼盔的另一層意義。

鋼盔對一位美國著名的將軍巴頓來說，也是他帶兵嚴明的象徵，他曾經嚴格的要求在軍中的每個人都戴上鋼盔，強硬的作風不僅是塑造軍人應該有的形象，另外也是讓士兵了解到當鋼盔戴起來的那一刻，也是強烈的讓士兵認知，嚴厲的軍紀開始了(Axelrod, 2009: 75)。

鋼盔不僅可以象徵紀律，也可以意味著陣亡，美國對於陣亡士兵的追悼儀式上，看似也是一種以象徵代替陣亡弟兄的身分，如圖 4-1 可以發現雖然看不到被追悼的樣貌，或許為順應戰場環境或文化上的差異因素，但用此方式卻建構出軍人光榮的犧牲，而鋼盔及兵籍牌代表陣亡的弟兄(Global Security, 1997)，因此可以看出用兵籍牌是代表個人，而鋼盔則代表英勇軍人的形象。過去我國也曾因為招募時所用的文宣品，誤用類似圖片，引發網路上撻伐聲音(李羽蝶，2017)，由此可見一般人對於象徵軍人的元素，也有一定的認知。



圖 4-1 陣亡士兵悼念儀式擺設圖

資料來源：Global Security(1997) website.

所以從沱江艦戰後紀實的照片中（如圖 4-2），可以看到艦長以及其他的同仁手中拿著經歷過砲火洗禮的鋼盔，鋼盔上呈現著被子彈貫穿的彈孔，傳遞出海戰過程的慘烈以及軍人為國捐軀、犧牲奉獻的精神，再加上當時的戰場環境，在海上搖晃不定、在夜間視線不明的情況下，一頂小小的鋼盔竟被敵人射中且貫穿，或許一般人民無法體會那樣的機率是多麼微小，但是在海軍艦艇服役的弟兄，勢必更能想像當時的場景，鋼盔上的彈孔，也使得沱江艦浴血奮戰的形象建立在人們心中。

另外，受損的鋼盔不只兩三頂，沱江艦將被擊中的鋼盔集中排列，從彈孔在鋼盔上的位置，有的對應出在太陽穴，有的對應在腦門或是後腦勺，不同的分布位置呈現的是槍林彈雨的場景。這些照片（圖 4-3）被攝影者認為具高象徵效果而被選擇，雖然照片中沒有人物，但對比背景掛在牆上的完整鋼盔，更能顯示出這些鋼盔「曾經被戴過」，而且相較於血肉模糊的畫面可能造成其他官兵畏懼戰爭的「絕望宣傳」(propaganda of despair)(E. L. Bernays, 1942: 237)反效果，鋼盔的意象更具有想像的空間。



圖 4-2 沱江艦長手持殉難官兵鋼盔圖

資料來源：《緬懷九二一臺海戰役 50 周年紀念專輯》。（張壽齡等人，2008：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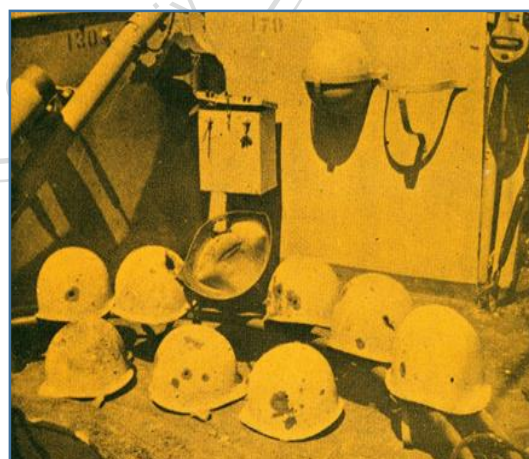


圖 4-3 沱江艦上陳列戰損鋼盔

資料來源：《七海雄風》。（海軍總司令部，1971：87）

貳、不沉的軍艦

回顧海戰過程中，由於沱江艦遭受中共快艇猛烈砲火攻擊，船上輔機艙中彈浸水，在輪機長即率領官兵執行抽水堵漏，確保船體浮力不至於沉沒，但也影響動力，最後由同行的柳江艦及維源艦拖帶回馬公港（陳清茂，2018：73）。

從沱江艦被拖帶的照片(圖 4-4)中可以看到，對比正在旁邊戒護的同型艦，沱江艦的舷號 104 已經沉到海平面，由此見進水的嚴重，而軍艦之所以不輕易棄船，要奮力堵漏、拖帶回港，其實是具有許多因素，從海軍的傳統與歷史來看，軍艦與一般船舶一樣，都會歷經命名及下水儀式，在儀式中由德高望重的人士，向艦艏投擲酒瓶並砸碎，以象徵好運(Zorlu, 2008)，因此不同於其他的軍事裝備，每艘軍艦都擁有自己的名字，從誕生到除役都有類似這樣隆重的儀式，代表軍艦對於海軍而言，並非只是裝備，而將其擬人化並投注以感情。



圖 4-4 沱江艦被友艦拖帶圖

資料來源：《驚濤駭浪中備戰航行——海軍艦艇誌》。(鍾堅，2003：198)

其實沒有沉沒的軍艦不僅是戰力的延續，也是一種勝利的認定，就像《尉繚子》在束伍令中對於戰果的賞罰認定，「得伍而不亡，有賞」、「得長不亡，有賞」、「得將不亡，有賞」，意思就是如果殺敵且自身沒

陣亡，就值得獎勵，在當時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概念，在民國 47 年 12 月 30 日中央日報報導梁序昭總司令在授勳典禮中強調：「只有我艦船不沉，才是真正的勝利，也只有我船不沉，才能創造下一次的勝利。」，因此在，軍艦在作戰後能順利返港，也是鋪陳作戰勝利的條件之一。

半沉的軍艦也可以透露出訓練精實的成效，因為一艘船當有破損進水時，必須進行堵漏作業，而堵漏作業牽涉到浮力穩定的計算、堵漏方式的決定甚至堵漏支柱的測量切割……等，是結合專業與團隊合作的一項作業，特別是在作戰過程中在機艙裡面的官兵，因為沒有直接面對敵人砲火，只知道遭敵圍攻卻不知道外面戰況，使得想像也成為最具破壞性的心理壓力(Cumming, 2008)，而沱江艦的輪機長曲以堂中尉在被彈藥破片擊傷的情況下，依舊帶著修理班成員執行搶救，直至海水沒頸才奉命離開機艙，因此在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所宣讀的《勳績詞》中除了「以寡擊眾」外，也特別強調「不棄船」的優良傳統精神，也是給予看到這照片的海軍輪機官兵一種正面的激勵。

參、傷痕累累的艦體

軍艦，不僅只是代表一個軍事單位，航行在海上更是一個國家主權的延伸，在海上對軍艦的敵對行為，無疑是象徵對一個國家軍事力量的挑戰，因此從中共方面對戰史的敘述，部分即是用「擊沉」來形容沱江艦，不難理解就是為了打擊國軍及國人的士氣。從我方紀實的照片中，沱江艦被拖帶返港靠泊時，可以看到船體傷痕累累彈孔斑斑(圖 4-5、4-6)，對於參戰的官兵而言，這些彈孔正是代表歷經海戰的證明，這可能只有參加過海戰的官士兵感受最強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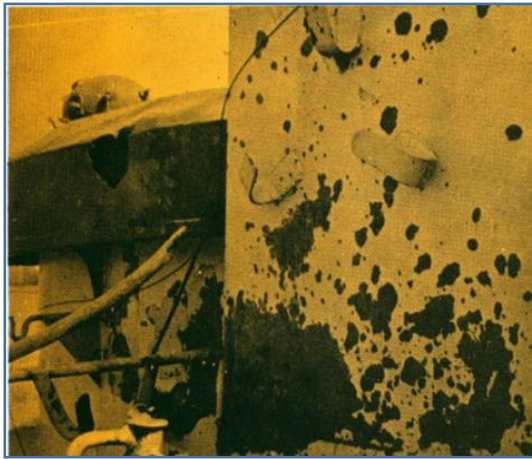


圖 4-5 沱江艦艦體戰損

資料來源：《七海雄風》。
(海軍總司令部，1971：85)



圖 4-6 沱江艦艦體彈孔

資料來源：《緬懷九二一臺
海戰役 50 周年紀念專輯》。(張
壽齡等人，2008：92)

而有些照片可能給同型艦弟兄的衝擊會比一般人更強烈，例如照片僅強調被匪艇擊破的舷窗，一般人心中產生的疑問是船上哪裡有這樣的窗戶，而對於同型艦的人，便容易感受到這大概是哪裡的舷窗(圖 4-7)，以及在作戰的時候，舷窗後面會有多少人，以及是什麼樣部署的人？被擊中之後，那些原本在裡面的人現在狀況如何呢？另外一張是照被射穿的門(圖 4-8)，一樣是同型艦的人才能反應出這是哪裡的門以及通往哪裡，並在海戰的時候誰可能會在門後面，由於窗戶及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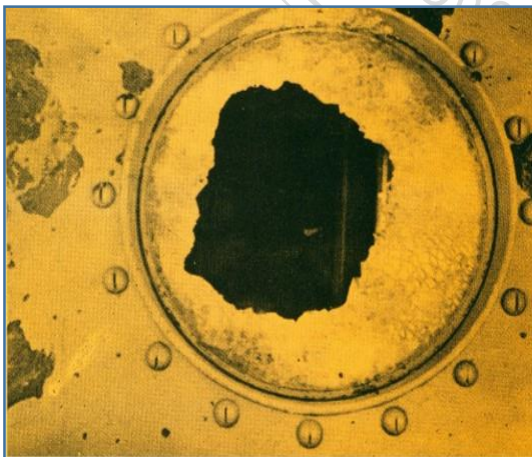


圖 4-7 沱江艦舷窗被擊破

資料來源：《七海雄風》。
(海軍總司令部，1971：84)



圖 4-8 艦艇遭砲火攻擊之彈孔

資料來源：《七海雄風》。
(海軍總司令部，1971：86)

其實都有讓人有區隔的印象，認為在後面是受到保護的，而照片傳達的訊息，似乎也正是敵人對同袍的威脅。

第二節 建構英雄的女性

西蒙·波娃認為，女性是男性的獵物，是男人所不能成為又想要的一切，也是存在的理由(De Beauvoir, 2010)，因此對被賦予象徵勇猛的官兵而言，獵物的存在也更強化了勝利狩獵者的地位，使得女性在戰勝形象的建構中，也是不可忽略的一個要角，也就是說，雖然當時的海軍艦艇單位還沒有女性的加入，提起海戰官兵英勇及戰勝時，出現的也是對男性官兵奮戰的畫面，但對於戰勝的形象建構，女性也是不可忽略的一個要角，甚至是說，女性雖未能直接參與戰鬥，但對於整個國軍作戰士氣，卻有一定的影響力。

壹、由襯托英雄的女性

為了形象的建立，在那個年代迎接海戰官兵歸來的過程中，幾乎都會安排佳麗獻花的程序，照片(如圖 4-9)中左列為參戰「九二海戰」的官兵，右列為迎接官兵的佳麗，獻花儀式所呈獻的是一種肯定，表示一種對軍人犧牲奉獻的敬佩，相片中官兵們在烈日下仍穿著長袖的正式白色甲式軍常服，整齊英挺的列隊而站，相對於輕便服裝以及帶著陽傘的女性，充分展現軍與民、男與女的意念，官兵已經接過佳麗手中的花，產生一種女性是依賴男性保護的角色，也是軍隊的支撐者，因此在安排獻花者為女性的場景下，似乎強調了在父權思想下女性的形象，更透露男人對女人另外的寄託，這時候想從女人身上得到的並不是肉體，而是一種只有她們才給男人的一種榮譽感(De Beauvoir, 2010: 236)。

由於當時的環境仍處於戒嚴時期，男性官兵對於女性的慾望仍被法律所限制，也就是結婚的權利並不像現在如此自由，特別是在反攻時間遙遙無期的狀況下，更是有成家打算，但卻因海軍總司令部規定而有所限制，除了結婚受限於需要報請核定外，對於士官及兵而言，更規定僅年滿二十八歲之技術士官才准報請結婚，而軍需文書類則是均不准結婚，然而部分人員因任務出國或其他等因素，而經濟充裕者，則違法私婚，進而衍伸出所生子女不能申報戶口之問題，因此在當時的士氣問題中，「私婚」也成為了海軍的一大問題之一（總統府，1956年5月3日）。



圖 4-9 沱江艦官兵接受佳麗獻花

資料來源：《緬懷九二一臺海戰役 50 周年紀念專輯》。（張壽齡等人，2008：23）

面對此嚴重問題，海軍總司令部也了解層出不窮的違法案例，使源於人性上的問題，因此曾建議設置立功特准結婚辦法，進而鼓舞士氣（總長辦公室，1956年6月6日），在「九二海戰」的參戰官兵中，也可以看到有功官兵因此由國防部特准結婚，如沱江艦艦長劉溢川少校於1962年8月結婚，並刊登於報紙上（〈英雄劉溢川 昨締白首盟〉，1962）；以及在國防部史政檔案目錄中，部分沱江艦官兵申請立功特准結婚。

但畢竟立功特准是少數，無法完全解決私婚問題，國防部對此問題的處理則是採取，不開放士兵私婚，對問題不做公開調查，且不承認士兵私婚事件，由各總部自行設法解決（總統府，1957年5月13日），由此可見此問題之棘手狀況。看的出當時部分男性官兵對於婚姻的渴望，已經超過對於法律的限制，也可以想像其他官兵也存有被女性認同的期盼與對女性想像。

壹、旗袍的形象

女性的形象其實是塑造的，在不同服飾下，也會呈現不一樣的女性特質，從迎接的佳麗中，不少與沱江艦艦長握手致意的佳麗（圖 4-10），就是著中國的傳統服裝「旗袍」，而旗袍本身就具有民族服飾與文化的代表性，但從旗袍所引發的熱潮，更能象徵某些意義，包含性感、女性特質 (Chew, 2007)。歷史上提到旗袍所展現女性特質成功的例子，不外乎就是在 1943 年 2 月，蔣宋美齡於美國國會演講中所著的緊身黑色長旗袍，開衩近膝，將女性特質蕪露無遺，從當時男性記者報導中，刻意強調旗袍的貼身與到膝蓋的開衩，使得高大的美國男人為之著迷，以及女性記者敘述到她那身體的形象，已經將整個國會掌握在手裡 (Esherick & Combs, 2015: 54)，就能看的出旗袍不同於一般服飾所能展現的魅力。

旗袍之所以能顯現出魅力，不外乎就是隱藏在設計的元素中，從立領、右衽的樣式、扣飾及側邊開衩，在加上顏色、圖案及款式，變化多端的組合，使得女性形象具有不一樣的效果，在民國時期的旗袍，也隨著設計的演進而有所改變，因此從台海戰役期間某次運補結束後的勞軍活動，所邀請來慰問官兵的女紅星，在旗袍的形塑下胸腰的曲線也跟身體趨近貼合，更呈現東方女性身體的形象 (Qi, Fan, & Cui, 2013)，另外旗袍不同於一般服裝的開衩設計，總體而言呈現一種，對

於一些正值年輕的官兵是更具吸引力，這些旗袍對於女性身體的要求，暴露胸部及臀部曲線所產生的刺激感可能比裸露更強烈(Ng, 2015)，使得人們認為只有苗條的女性才能展現出旗袍的美(Yan, Bian, & Feng, 2014)，從照片中背景的官兵散發愉悅的表情(圖 4-11)，看的出在，說明了女星的出場起了一定的慰藉作用。



圖 4-10 佳麗對艦長劉溢川致意

資料來源：《緬懷九二一臺海戰役 50 周年紀念專輯》。(張壽齡等人，2008：93)



圖 4-11 運補後香港紅星勞軍

資料來源：《緬懷九二一臺海戰役 50 周年紀念專輯》。(張壽齡等人，2008：66)

第三節 象徵榮譽的虎旗與勳章

慶功儀式是作戰後建立形象的重要程序，正因為在有戰功的前提下才會慶祝，許多儀式都是及程序往往都是在有特殊功勞時才會舉辦，也因為具有稀少性更能突顯作戰的成就，因此在軍中不外乎就是頒授獎章、獎金、獎狀……等，來對功勞具體化，並因為具體化的關係而產生了形象建構的功能。

從「九二海戰」中對於參戰團體及官兵的敘獎，也可以看出對於作戰功勞程度的差異，在加上頒授虎旗、與領袖合照、核予獎章等等，一系列的獎勵對於勝利的形象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構，也讓其他人產生憧憬與嚮往。

壹、虎旗的頒授

從給沱江艦頒授榮譽旗的勳績詞中，描述因在「九二海戰」中的戰果及精神難得可貴，是近代海軍史上所罕見且中外交譽，因此頒授在當時是代表給予部隊最高榮譽的「虎旗」(圖 4-12)，而沱江艦也成為海軍艦艇單位中，唯一一艘榮獲虎旗的單位。

自古以來，老虎的形象已經深入在文化與信仰之中，認為祖先可能化身成為老虎來保護家族，或是把老虎的形象當作護身符，另外於統治者在老虎的形象上作操作，例如在肖像畫中，呈現坐在披著虎皮的椅子上，象徵如同狩獵者的權力與統治(Marks, 2006)，因此可以看的出老虎對於人們有多種不同的形象，但通常都離不開，對百獸之王的想像，也令人聯想到勇猛、威武的形象。



圖 4-12 頒授沱江艦之虎旗

資料來源：《緬懷九二—臺海戰役 50 周年紀念專輯》。(張壽齡等人，2008：75)

這些形象都會對周遭的人發生行為上的影響，有研究指出這種稱為「擴散激發理論」(spreading activation theory)，例如有實驗指出利用愛心的募捐箱，會比其他情狀的箱子獲得更多的捐款，原因就在於「心型」的形象與愛情、浪漫、慷慨等相關，因此影響了心理而產生人們捐獻的舉動(Guéguen, Martin, & Stefan, 2017)，因此從這個角度來

看，當老虎的形象，投射在旗子上在授予部隊的時候，其實就是將形象投射在部隊上，雖然照片（圖 4-13）中難以觀察沱江艦弟兄的表情，但可以想像隊於沱江艦的弟兄而言，虎旗給予他們一種有如萬獸之王的勝利者身分，也就是說虎旗就是形象上的確認。



圖 4-13 沱江艦官兵與虎旗合照

資料來源：《緬懷九二一臺海戰役 50 周年紀念專輯》。（張壽齡等人，2008：82）

其實不僅只有沱江艦得到形象上的確認，對於授旗的領導者而言，也無非是一種身分的確認，就像是狩獵者的姿態，掌握了虎旗動向，從照片看得出來，總統授權給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頒授虎旗，總長在典禮上將虎旗交給了沱江艦艦長（圖 4-14），沱江艦艦長接收虎旗後交



圖 4-14 參謀總長交付虎旗

資料來源：《七海雄風》。（海軍總司令部，1971：98）

給了旗兵（圖 4-15），最後全體以及旗兵一同向總長敬禮（圖 4-16），整個權力的結構在此已經獲得重新確認。



圖 4-15 沱江艦艦長接收虎旗

資料來源：《緬懷九二一臺海戰役 50 周年紀念專輯》。（張壽齡等人，200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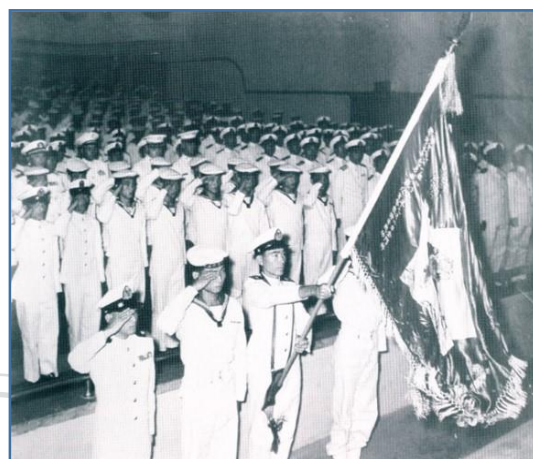


圖 4-16 全體向主席敬禮

資料來源：《緬懷九二一臺海戰役 50 周年紀念專輯》。（張壽齡等人，2008：46）

而權力結構的確立，也強化了旗幟所帶來的形象，由於旗幟的象徵意義會使周遭的人發生行為上的影響 (Guéguen et al., 2017)，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當老虎的形象，投射在旗子上並授予部隊的時候，其實就是將形象投射在部隊上，可以想像對於沱江艦的弟兄而言，虎旗給予他們一種有如百獸之王的地位，也就是說，虎旗是在形象上，作為戰鬥勝者的身分確認。

貳、與長官的合照

在慶祝的過程中，部隊與長官合照也是必要形成，這也是另一種對部隊的肯定，並且從不同的背景、隊形都能呈現不同的效果，像是總統與海戰有功人員合照（圖 4-17），從左右對稱的安排，如同塑造出簇擁中央的形象，而比較特別的是第一班在有一位負傷人員右手包著繃帶，如同強調負傷不退，仍然在第一線的勇猛，然而在另一側相對位置的弟兄，亦似乎要呈現對稱畫面，因此刻意彎曲起左手。

同樣是團體照，部分就顯得較不拘形式，如圖 4-18 雖然右下角有

某項裝置擋住畫面，排面班有身高差異、後面隊形也相對隨興，整體而言比較像是側拍照，而在烈日下照片中大部分的臉部被光影所遮蔽，但看得只有一位坐在部隊最前方，這比起站著更能突顯出身分的差異，明顯能判斷這就是總統，而背後的官兵由於也無法辨識身分，所呈現出更多的是一群共同體的形象。



圖 4-17 總統與海戰有功官兵

資料來源：《緬懷九二一臺海戰役 50 周年紀念專輯》。(張壽齡等人，2008：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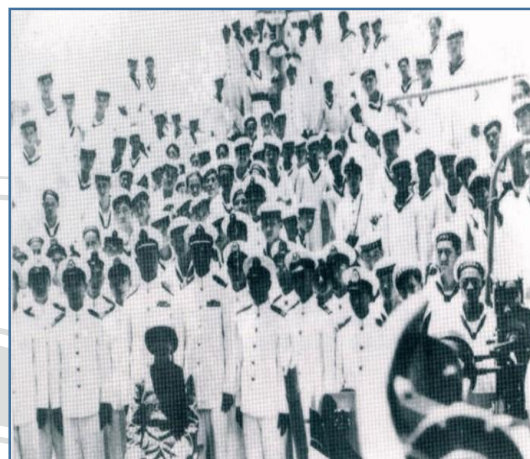


圖 4-18 總統與沱江艦官兵合照

資料來源：《緬懷九二一臺海戰役 50 周年紀念專輯》。(張壽齡等人，2008：76)

越多不同的長官來慰問代表的是對事件的重視，圖 4-19 與沱江艦合照的是蔣經國先生，由於在碼頭沒有台階的設施，為了使每個人能入鏡，因此第一排安排為蹲姿的士兵，第二排則是軍士官幹部，這照片彷彿展示的就是曾經到過軍港，如同曾到此一巡，像這類有具特別背景的照片，則滿足了一些無法親身蒞臨的觀看者一種視覺凝視。

但照片中也隱藏的當年海軍的一些狀況，海軍人員較容易發現後方幹部是著一般日常的軍便服，另外加著領帶代表更為正式，而蹲著的士兵則是著海軍更正式的軍常服，屬於參加典禮時的服儀，這種服裝上的差異，似乎反映當年海軍士兵在士氣上的問題，從民國 45 年 6 月《國防部海軍士氣視察總報告建議部分檢討會紀錄》中，紀錄了「士兵工作服僅有一套無法換洗為目前駭感嚴重之問題……」，而決議事項

是由第四廳研究具體解決辦法專案簽請核示，直到民國 46 年 10 月再一次士氣調查，5,700 人中對於「衣」的部分佔 63.9%的人表示「外出服工作服都不夠穿」(國防部，1957 年 8 月 12 日)，也使得整體對「對裝備之信心」為對低的項目。

因此，對於當時的士兵而言，外在形象也是留下回憶的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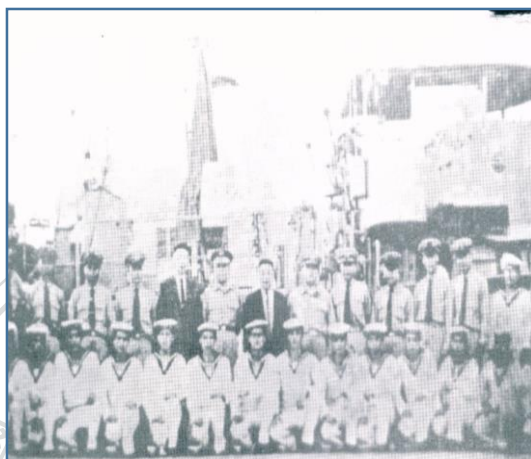


圖 4-19 蔣經國先生與沱江官兵照

資料來源：《緬懷九二一臺海戰役 50 周年紀念專輯》。(張壽齡等人，2008：80)

但也是顯示為了建立勝利的形象，適時的隱藏問題也是必要的手段。

另外，除了團體照之外，與特殊身分人員的拍照，也能呈現不一樣的感覺，如圖 4-20，總統背後的四位海軍軍官由左至右分別是，維源艦艦長陳連生少校、海軍總司令梁序昭上將、南巡支隊長姚道義上校及沱江艦艦長劉溢川少校，形成一種菁英的集合，這相對於團體照，會給予個人更高的榮譽感，也讓其他人有就如同脫穎而出的形象，更容易建構出英雄的身分，但唯一讓人不解的是，同樣有參戰的柳江艦卻未見在其中，然而這也是照片無法敘述的疑惑。

除了正式場合與長官的合照之外，也會有一些不經意的側拍，這取決於攝影者在當下所構思的攝影方式，圖 4-21 照片為總司令梁序昭上將與沱江艦艦長劉溢川少校的合影，特別的是，攝影者的角度似乎

是站在被砲彈射穿的破口，或許攝影者想藉由破口拍攝裡面的人，呈現在海戰中的危險情況，而恰好照片中的劉艦長正用手指著破口訴說的事情，梁總司令像是在看著破口卻也像是在看著鏡頭，唯一的時機點，巧合的拍下了這張照片，從破口外向裡面看猶如站在敵人的立場反覘自己，看背景的電線及背後的舷窗，研判位置應該是在操縱艦船的駕駛臺，也隱約透露出敵人似乎是有目標性的射擊。



圖 4-20 總統與各部隊長合照

資料來源：《緬懷九二一臺海戰役 50 周年紀念專輯》。(張壽齡等人，2008：77)



圖 4-21 總司令與沱江艦長合照

資料來源：《七海雄風》。(海軍總司令部，1971：92)

第五章 規訓的重現

建構「九二海戰」勝利的形象，不僅是為了要產生認同感，也是為了提升當時擔憂的士氣，並且希望藉此能使官兵效法這些曾經參戰的官兵，所展現的勇猛行為及不撓精神，當這些內容持續不斷的透過宣傳，使得成為海軍的官兵的一個想像共同體，以及走向規訓的階段。

規訓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要讓官兵認為在遭遇到，與中共發生海戰時，要效法沱江艦那樣浴血奮戰的精神，才是應該要有的行為規範，因此要將這樣的想法，內化到官兵心中，就必須讓官兵集體認同勝利的「九二海戰」，以及使其有足夠的動機。

回顧當時的執行做法中，其實對集體認同與動機的產生都有一定的效果，由於當時正處於台海危機期間，國防部遵總統指示，於民國47年9月18日時，呈總統一份「激勵金馬守軍士氣辦法要點」，其中律定一項工作項目為「展開立功競賽號召立功」，並在之後的「激勵金馬守軍士氣辦理情形概況表」中，顯示執行的範圍已經不僅侷限於金馬地區，而是要求「以陸軍連海軍艦艇空軍中隊為單位舉行討論...」，並以下從執行工作項目中，可以看出對於部隊，都有建立想像共同體及規訓的效果（總統府，1958年10月16日）。

一、精神動員部分

（一）擴大表揚立功事蹟，並展開立功競賽。

（二）舉行宣誓效忠儀式及爭取首功座談會。

二、加強康樂部分

製作雄壯激昂之軍歌印發全國軍民演唱並交各電台廣播。

三、宣傳激勵方面

（一）印發傳單及文宣。

（二）發動各報刊報導激勵士氣新聞。

這些工作指導，成為了宣傳作戰戰果的動機，也促使著海軍運用各種方式傳達「九二海戰」的精神，並隨著政治環境因素，加以調整演變，最後成為一個規訓官兵弟兄的基本平台，以下將分析當時符合上述指導的作為。

第一節 軍事新聞的規訓

從民國 47 年 10 月國防部在「激勵金馬士氣辦理情形概況表」(總統府，1958 年 10 月 16 日)中，對於宣傳激勵方面已經要求軍事新聞社，及策動各報刊加強對激勵人心的戰訊報導，從「想像共同體」的角度去思考共同意識建構的過程，在十八世紀時歐洲的想像形式，是以小說及報紙，作為想像共同體誕生的重要工具，相對於我國當時軍中所發行有限定內容的刊物中，這些刊物似乎也存在有一樣的效果，像是青年戰士報所報導三軍在各地區戮力戰訓本務或是執行戰鬥的敘述，讓他們對於不認識、處在不一樣地點、從事不一樣任務的同袍，了解彼此有共同信念，而具備完全的信心。

當這些軍中的刊物，開始敘述「九二海戰」時，「九二海戰」的意象，就在每個人的心中逐步建構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在大量的印刷品以及詞語的整合之下，例如對「九二海戰」的描述，以「以寡擊眾、同舟共濟」等用詞作為代表，並不斷重複出現，更容易使得大家認知的海軍，已經不是侷限在派系的界線或是不同艦型間的優劣隔閡，因此在認同方面成為一種集體的認同，運用想像產生的共同的認知，就如同一種「社會事實」，從最低階的二兵到單位最高階的軍官，都對「九二海戰」所代表的精神，產生一樣的認知。

壹、青年戰士報到青年日報

青年戰士報為民國 41 年時，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所創辦，為的

就是作為軍方的文宣工作，不僅對軍中宣傳，也對外界有宣傳效果，尤其是在軍隊內，這類軍方的報紙往往成為主要的資訊來源，而內容方面早期多在政策宣傳及部隊的活動，隨著時代的演變，及讀者的範圍擴大，內容也趨於多元。

至於「九二海戰」在年度內報導的分布方面，筆者觀察在年度配合紀念日報導的內容，因在配合紀念會內容時，會有較多高層發布演說之內容重點，或是特殊專訪，較具有傳達政治方面意義，因此本段重點，將著重在探究年度紀念日時，對於「九二海戰」的相關報導。

回顧青年戰士報與青年日報中，對於「九二海戰」的象徵意義也順應著當時的環境而有所不同，由於「九二海戰」後的形象建構，以及往後每年的慶祝大會，使得規訓的作用得以延續，因此在報導中常常置入當時的政策及思想，促使達成所要的規訓目的，至此「九二海戰」所要傳達的意義，已經不再侷限於歷史所描述的範疇，而是成為了思想宣傳平台，不同的思想結合「九二海戰」後，也將變的更順理成章、理所當然，而梳理青年戰士報及青年日報每年在紀念日九月二號前後，對於海戰的報導內容及方式，可以歸納成以下幾種操作的方式：

一、特殊事件的敘述強調

由於受到報紙版面篇幅的限制，以及不同時間點所著重要點不同，因此對於戰史的敘述與著墨程度，也跟著有所影響，從以下幾篇報導內容，均為偶時對特殊事件的強調：

- (一) 民國 76 年 9 月 2 日在《青年日報》第五版，一篇名為「追憶九二海戰官兵血肉築長城今仍豪情萬丈」的報導中，敘述了沱江艦醫官陳科榮，並強調在負傷成仁前一刻，仍持續為官兵裹傷；電機士官長朱慰宇以肉身堵住艦艇破口阻

止進水，直到海水沒頸才奉命離開；舵手溫成灝負傷仍緊握舵盤至副艦長接續替補，以上均為強調堅守崗位的代表，相對於其他宣傳戰功的報導而言，此部分更能引起士官兵階層的共鳴，進而產生效法之功能（汪珍，1987）。

（二）在民國 78 年 9 月 2 日《青年日報》的第二版，報導「再創『九二』海戰勝利光輝戰果」（劉毅夫，1989）中，以「戰場堅守保密原則」為段落標題，來敘述記者劉毅夫在隨南巡支隊往金門前，與支隊長在麵店相遇，卻因保密而對記者視若無睹的經過，相對於其他年份之單純敘事報導，本篇則是有特別教化官兵必須效法這種保密精神的意味。

二、因應政策的意義延伸

由於時間的演進，在軍事的政策上也有所更新，利用「九二海戰」既成的宣傳平台，包裝想要宣傳的政策，也成為政府重要的規訓手段之一，以下便是「九二海戰」配合政策的案例：

（一）響應毋忘在莒運動

蔣中正總統在民國 53 年時，號召推動「毋忘在莒」運動，目的在堅定眾人反共的決心，因此在民國 54 年 9 月 1 日「九二海戰明七週年海總將舉行慶祝會」的報導中，便響應因應貫徹「毋忘在莒」運動之節約規定不予以擴大，僅辦理紀念會及部隊康樂競賽。

（二）支持軍武籌獲

民國 84 年，因應我國在潛艦兵力不足，且在多方軍事考量下，我國海軍成立潛艦發展辦公室，積極於推動潛艦籌獲，為配合政策推行，當年對於「九二海戰」紀念日的報導中，特別專訪了三軍大學海院總教官章長蓉少將，以

一篇「九二精神 海軍圭臬」，敘述了戰役對整個海軍的影響，另外也說明我國海島地形，進出航運的安全是國家生存的命脈，因此反封鎖作戰是相對重要，附上照片（圖 5-1）輔以說明潛艦是反制中共海峽封鎖的關鍵（朱泰榮，1995），順勢將「九二海戰」要捍衛台海的精神，延伸到潛艦的必要性上，此時「九二海戰」也成為了潛艦籌獲的推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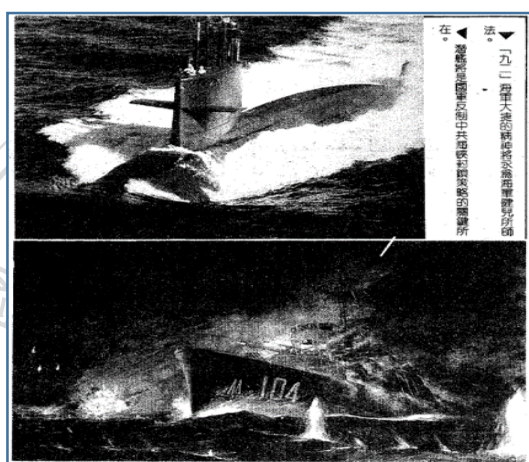


圖 5-1 報紙版面中潛艦與沱江艦

資料來源：朱泰榮（1995 年 9 月 2 日）。九二精神 海軍圭臬。青年日報，第 4 版。

民國 93 年 3 月時，因應中共軍力發展迅速，台灣首次舉辦全國性「防禦性公民投票」，主要是在討論三項軍購的可行性，雖然最後公投領票人數未達標準而否決，但是國防部對於宣傳三項軍購的重要性仍不遺餘力，因此「九二海戰」此時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民國 94 年 9 月 2 日《青年日報》的一篇對淡江大學翁明賢教授的專訪「九二海戰制海作戰教範」，由「九二海戰」分析爭取制海之重要，也因當時裝備方面較中共優勢，成為海戰勝利因素之一，逐漸引述出目前兩岸軍力持續失衡下，我國當前軍力的不足，

進而強調三項軍購的重要性（李耀杉，2005），此時「九二海戰」成為三項軍購的基礎史證。

民國 103 年，我國建造高效能艦艇舉行下水並命名為「九二海戰」中立下輝煌戰功的「沱江」，這是我國海軍第三次將艦船命名為「沱江」，藉由「九二海戰」所傳承的精神，強化了國艦國造的必要性。

三、對於戰史敘述的調整

由於海戰難以求證細節的特性，因此對於戰史的內容往往多有異同，而藉由對於戰史敘述的調整，也具有傳達不同意義的功能。

在多數的青年日報(或青年戰士報)的報導中，對於沱江艦的作戰過程描述，幾乎是單艦赴戰，如同民國 51 年 9 月 2 日報導「輝煌戰績垂青史揚威立功大丈夫 姚道義等事蹟極感人」中，報導沱江艦是單艦深入敵群中；民國 76 年 9 月 2 日報導「追憶九二海戰官兵血肉築長城今仍豪情萬丈」中，強調沱江艦單艦挺進、視死如歸、浴血奮戰，然而在少數報導中，卻有發現不一樣的描述，如民國 75 年 9 月 2 日青年日報「發揚『九二』海戰 以寡擊眾的精神」的報導中，對於作戰過程的描述為「沱江」、「柳江」兩艘在旗艦「維源」艦指揮下彼此相互合作、支援，使火力發揮到最大威力，才能將蝟集而至的匪艦一一擊沉，也就是強調偕同作戰的重要，與大部分文獻敘述沱江艦幾乎是單艦作戰，因此這樣的描述顯現了對於戰史描述與解釋的多元性與模糊性，也正如姚道義支隊長在接受採訪時所說的，這是一場「看不到的戰爭」。

四、多元的形象建構

報紙除了著重在文字的敘述之外，另外隨著內容越來越多元，雖然在青年日報中插圖成分並不多，但也成為了形象建構的手段之一，例如以下插圖（圖5-2）是記者為紀念「九二海戰」所繪製，並利用「92」當作舷號來突顯我海軍的勝利，但值得注意的是，圖中的船型是當時的「陽字號」型艦，相較於參戰的「江字型」，「陽字號」有更強的火力及更重的噸位，因此整張插圖所呈現的，是想與戰敗落水共匪，對比相對壯盛的軍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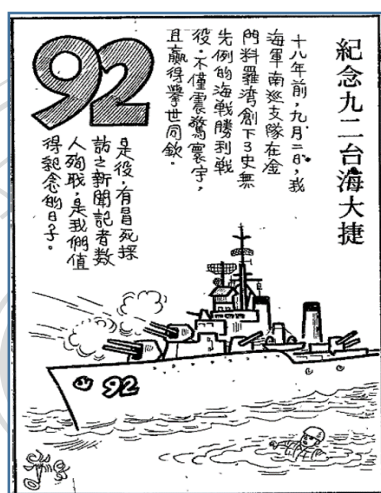


圖 5-2 「九二海戰」插圖

資料來源：紀念九二台海大捷（1976年9月2日）。青年戰士報，第2版。

貳、時間演變下的「九二海戰」

由於前述發現到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九二海戰」也會藉由不同的手段呈現，去傳達政治及思想上的訊息，因此透由這些報導內容的變化，便可以觀察再規訓內容上的演變。

一、淡忘的領袖

在當時，所有的困苦都被塑造成，因為共匪竊占大陸所造成，士兵的心理狀態呈現「最大的希望是反攻」，對於領袖的信仰也在士氣調查中排名第二，僅次於「反共抗俄」（總統府，1956年5月3日），這種對於領袖崇敬的氛圍，也反映在「九二海戰」的報導中。

觀察「九二海戰」的紀念日報導，有關「領袖」一詞部分，其中民國54年以前，對於領袖的論述，偏向領袖的功能，如民國50年9月3日青年戰士報第3版「慶台海戰役三週年黎總司令主持訓勉」報導，黎玉璽總司令敘述「海軍的光榮是領袖所賜予...」；民國51年9月2日青年戰士報報導「國民革命軍的新海軍，是在領袖的精神感召下...」，而在民國55年之後，則偏向領袖的要求，如民國55年9月2日青年戰士報第2版報導「反攻復國必勝之理.....尤在於對領袖、對主義、對國家的忠誠」；民國60年9月2日青年戰士報報導「...全體官兵將心交給國家與領袖...」，以及之後的「遵循領袖訓示」、「恪遵領袖」等字眼，直至民國61年以後，則鮮少出現相關字眼。

「領袖」一詞的淡出，仍需細究當時的政治氛圍與時代背景，但顯而易見的是，在「九二海戰」的勝利宣傳中，必然具有鞏固領袖地位的意涵，也表現出海軍極力挽回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這其實突顯出了蔣介石早年對海軍的疑慮，以及任用陸軍擔任海軍總司令的不信任感。

二、從反共到和平

歷年「九二海戰」紀念日的報導中，往往會透露出當前兩岸的關係，而使「九二海戰」所要訓勉官兵的內容也會隨之變化，在民國50年9月3日「慶台海戰役三週年黎總司令主持訓勉」報導中，黎玉璽總司令提及「反攻復國」一詞，在經過馮啟聰、宋長志及鄒堅等歷任總司令，都在紀念日中，以此為使命作訓勉，僅用詞或有些許不同，如「復國建國」、「反攻聖戰」等，但表達都是反共的信念，透過此來規訓官兵應該有的作為。

然而，於民國70年鄒堅總司令任職期間，相關字眼逐漸消失，除

了反映出政治的改變外，也代表賦予「九二海戰」的使命並非一成不變，亦是順應著國防政策而改變，我國從民國 38 至 58 年，秉持「攻勢作戰」，強調反攻大陸，民國 58 至 68 年，由於兩岸情勢改變，調整為「攻守一體」，到民國 68 年至 91 年，放棄攻勢，採「守勢防衛」。

對比中共對臺動武的態度發展，1979 年 1 月，鄧小平在美國發表演講時表示，將不再用「解放台灣」說法，到 1983 年 6 月，鄧小平發表兩岸和平統一的言論並被視為「一國兩制」的政策確定，至此我方雖然仍未鬆懈對中共統戰手法的警覺，但兩岸關係從原本「軍事對立與衝突時期」已逐漸邁向「開展兩岸交流與協商時期」(張亞中、李英明，2000：208-220)，到江澤民時期雖曾釋出柔性的「江八點」政策，但仍不放棄以武力犯臺，胡錦濤時期基本上承接以往立場(王官德，2005)，到現在習近平時期，軍事方面已呈現不對稱狀況，對我而言，「反攻復國」早已非時代趨勢而隨著時間邁入歷史，因此更說明了「九二海戰」也從原本的承接領袖保證復國使命，轉變為我海軍確保台海和平穩定的精神力量。

三、戰果的差異

基本上，筆者觀察青年戰士報及青年日報中對於戰果的敘述，可以區三種類型，分別為「詳細報導」、「粗略報導」及「例外報導」，在「詳細報導」方面，意旨對於對於敵人艦艇的種類及損傷，做明確的區分敘述，包含艦型為「魚雷快艇」或「砲艇」，以及傷損為「擊沉」、「重傷」等，甚至將沱江艦之戰果特別強調，原則上沱江艦的戰果是以民國 48 年 9 月 2 日頒發榮譽虎旗時的勳績詞「一舉擊沉匪魚雷快艇八艘，大型砲艇兩艘，重傷兩艘」，另外沱江艦戰果為「擊沉匪艦艇五艘」為主，更具體的描述是在民國 51 年九二紀念會的報導中，黎玉璽總司令描述沱江艦為「擊沉魚雷快艇五艘，重傷二艘」，由這種詳細

報導的方式，給予讀者更寫實的視覺畫面，也為沱江艦強化了英勇的形象。

「粗略報導」則是將敵人艦艇的種類及損傷做概括性的描述，不加以區分，例如不區分艦型，僅以「艦艇」表述，以及用「毀傷」作為戰果的敘述，例如海戰隔日，青年戰士報即以「一舉殲滅十一匪艇」、三週年時報導「十二艘匪魚雷快艇全部殲滅」，或以「零比十二光榮戰績」等類似報導不勝枚舉，其作用除了可以簡約文字敘述外，並能將戰果數量整合，形成懸殊對比，使讀者有更多想像空間。

「例外報導」則是不同於其他大部分報導的內容陳述，大部分是戰果數量的差異，例如民國 67 年九三軍人節特別報導第三版其中一篇「料羅揚威、長留戰史」，報導沱江艦戰果為「擊沉了十一條匪魚雷快艇，兩條快速砲艇，重傷魚雷快艇一艘」，以及民國 99 年九二海戰五十二週年的專題報導中，一篇「料羅灣外奮勇抗敵 錨鍊精神典範」敘述「沱江艦以單艦擊沉共艦八艘、及傷大型砲艇兩艘的輝煌戰果」等，在特別報導中均對沱江艦放大戰果，幾乎涵蓋整個海戰，雖難以探究數字來源，但對於海戰史不慎了解的人，勢必對沱江艦產生深刻印象。

此外，與其他媒體之間也會產生相互影響，因此報導內容也難以考究來源，例如中央社在民國 50 年 9 月 2 日所報導的「臺海喋血回憶紀念『九二』海戰三週年」中，提到戰役最終擊沉艦艇 13 艘，擊傷 4 艘，雖然對部分讀者認為些微的數字差異無關緊要，但其實這往往都隱含當時的某些問題。

戰果往往是激勵士氣的一大關鍵要素，也是評斷功過的重要依據，然而海戰的戰果具很難被驗證的問題，對此從一份民國 47 年 7 月「海軍戰果處理辦法草案」（海軍總部，1958 年 8 月 30 日）中可以看出對於戰果審查需要盡量蒐集有利佐證，的參考，如照片、海面漂浮物，

然而當時夜間能見度有限、加上戰況激烈，且戰後艦艇狀況危急，可以想像已無心力執行證據蒐集，因此從「海軍金門作戰檢討報告」（總長辦公室，1958年10月22日）中，「九二海戰」後未清理戰場，以致未獲得任何戰利品及俘虜也列為戰役缺失之一，因此也可能成為戰果有所差異。

當然戰果的異同現象不僅發生在公開的報紙中，在官方出版的專書中也有出現類似的現象，民國87年由國防部軍務局出版的「八二三台海戰役」一書中，有關海戰檢討的部分，紀錄「沱江艦擊沉共艇二、傷共艇一；維源與柳江擊沉敵艦八艘」（國防部軍務局，1998：141-147、311），這也顯現官方資料也存在著某些落差。

甚至在官方內部的機密資料也有此狀況，例如從民國47年「海軍總司令部金門炮戰作戰檢討報告」中，敘述「九二海戰」戰果為「造成匪快艇十一艘及砲艦二艘之沉沒，以及匪PC二艘，快艇一艘重傷之空前紀錄」（總長辦公室，無日期）；民國57年5月所頒「海軍歷次海戰經過檢討報告」中，戰果均為擊沉快艇8艘及大型砲艇3艘（海軍總部，1968年6月1日）。

總結來說，戰果的敘述可能依照報導的篇幅、重點而使得敘述方式有所改變，在數量方面筆者認為可能囿於當時資訊流通有限，因此承襲其他資料時難以考究，因此產生資料上不斷引用下也免產生差異，然而隨著戰爭型態的改變，艦砲作戰、短兵相接的戰場狀況可能以不復見，因此戰果數量對於現代戰爭的參考價值已經逐漸稀釋，所需擷取的反而是精神戰力部分。

四、型塑的台海精神

由於精神戰力才是真正可以流傳及效法的，而在「九二海戰」後，對於精神戰力也是一個型塑與轉變的過程，由不同的總司令加以註解

而逐漸具體化。

民國 48 年梁序昭上將擔任總司令時，以「勳績詞」敘述的「『以寡擊眾』及『不棄船』之優良傳統精神」作為代表，到黎玉璽擔任總司令，出現了「台海精神」，內容主要為「冒險犯難」「以寡擊眾」、「互助合作」、「同舟共濟」(〈發揚台海精神完成反攻復國使命〉，1964)；馮啟聰擔任總司令時，對台海精神有了新的定義，認為「台海精神」就是海軍的傳統精神，和陸軍的「黃埔精神」，空軍的「笕橋精神」，在國民革命奮鬥史上將先後輝映(〈發揚台海精神爭取更大勝利〉，1966)，此時可以看出海軍有了足以比擬其他軍種的精神象徵。

宋長志擔任總司令時，對「台海精神」多了一層註解，認為「台海精神」真諦包含五種精神：「以寡擊眾的革命精神」、「見敵必戰的攻擊精神」、「冒險犯難的犧牲精神」、「永不棄船的海軍傳統精神」以及「同舟共濟的團結精神」(〈發揚台海精神海軍盛會紀念勝利〉，1970)；到伍世文擔任總司令時，「台海精神」又有新的含意，認為捨己救人、獻身赴義的英勇表現就是「台海精神」(〈紀念九二海戰勝利 海軍秋祭忠烈將士〉，1988)；而延續到苗永慶擔任總司令時，「台海精神」卻相較以往少了「見敵必戰」這一項(〈九二海戰同舟共濟錨鍊精神以寡擊眾〉，2002)，此也反映了在兩岸在當時和平的訴求，這些精神意義並非後者取代前者，而是不斷的演變與註解，得以調整規訓海軍官兵的內容，進而符合當時的政治氛圍。

第二節 傳唱的軍歌

軍歌是軍隊用來激勵士氣的一項方式，就像是有研究指出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勝利靠的不是精良的武器與戰術，而是靠士氣，這士氣的由來部分就是透由抗戰歌曲所引發，思想寄託於歌詞，歌詞

在藉由歌曲傳達到聽者耳裡，隨著唱軍歌是每日例行工作，更強化了抗敵的意志(Howard, 2015)；在中國的傳說中，也看見運用軍歌打勝仗的例子，如黃帝與蚩尤的某場戰役中，追擊蚩尤部落至彭河，因見士兵倦怠且河水湍急，因此令軍師作「渡樟之歌」使得士氣大振，抱浮木渡河，成為歷史上最早運用軍歌的說法(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2003)。

從國防部對軍歌方面的重視可以在「激勵金馬士氣辦理情形概況表」中看到，為了激勵金馬前線士氣，錄製了一首「金馬戰歌」，除了各報公布外及各公私營電台廣播外，另印製兩萬份頒發全國軍習唱(總統府，1958年10月16日)，這種運用軍歌來傳達思想意念的做法在海軍也存在，如海軍軍歌及海軍軍官學校校歌等，另外在「九二海戰」後也有相關的歌曲產生。

首先是海軍軍歌，此首歌為每個海軍官兵進入海軍的固定驗收歌曲，也是早點名時固定歌曲，歌曲的創作起源於桂永清上將擔任海軍總司令的年代，並由他來填詞，當時的海軍氛圍存在著派系以及對過去的包袱，因此第一句便唱出了「我們是中華民國的新海軍...」，這一句「我們是」便排除了同一時間在對岸的共產黨以及過去的形象，創造出一個「競爭的、比較的場域」(吳叡人(譯)，1999：54)，接著雖然歌詞未直接敘述「九二海戰」的字眼，但其中的含意，卻與海戰塑造出的「台海精神」息息相關，如「同舟共濟、萬眾一心」，以及「養成忠勇冒險之好精神」，便是與宋長志上將擔任總司令時，所詮釋的「台海精神」相呼應，旨在期勉海軍軍官能夠效法前人的精神，整體而言，一首海軍軍歌點出了時代的背景與海軍的期許。

也有直接傳唱「九二海戰」的歌曲，如「忠義之歌」便是為此誕生：

忠義之歌

佚名詞 佚名曲

蔚藍的天空白雲片片，
碧綠的海水雪浪滔滔，
海上的健兒志氣豪，披忠肝瀝義膽，
掀起了忠義熱潮。

心忠行義奮勇殺敵把國保，
負責守紀私偏欺疑皆可拋，
忠心貫日月，義風薄雲霄。

天空興奮的風聲瀟瀟，
海水也狂舞地激起波濤，
風聲瀟瀟，海浪滔滔，

台海戰役敵喪膽，忠義軍風滅敵人

這首歌的最後兩句「台海戰役的喪膽，忠義軍風滅敵人」正是在意指「九二海戰」，但值得令人注意的特點是：

- 一、這首歌的作詞、作曲者已不可考。
- 二、修訂前，原本歌詞為「台海戰役的喪膽，忠義軍風滅朱毛」。
- 三、歌詞偏重謹慎的一般性敘述，並與海戰關聯性不高。雖然這首軍歌，提到了「九二海戰」，但如果了解「九二海戰」發生的時間是在午夜凌晨，就會發現歌詞的敘述並非在塑造海戰的場景，而是從描寫一般海軍白天從港口啟航出海的視角，並由海上健兒乘風破浪與「忠心昭日月」、「義薄雲霄」結合出忠義軍風的形象，而「九二海戰」與此歌曲的結合點，是以忠義軍風融入了歌曲裡，或者說整首歌的敘事便是為了強化「九二海戰」的忠義軍風形象。然而這樣一般性的敘事、佚名的作詞、作曲，這首歌之所以被傳

唱，就好比是無名氏的紀念碑，沒有人可以指認出原本作者的創作靈魂，佚名作者是不是一位海軍官兵，才能描述出這樣的視角，因此留給海軍官兵的是一種想像，佚名作者也就不代表個人，而是代表全體。

第三節 九二台海勝利紀念碑

紀念碑往往在紀念重大事件或是人物，而在軍事的範疇中，紀念碑的常常不僅用來作為對戰役或是人物的紀念，甚至是連結戰爭、政治、國家、歷史脈絡、陣亡烈士的關鍵(Åse, 2020)，從而在其中產生各種想像，這種想像也會影響周邊的人，就像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所述「我們被型塑於我們所建造的建築物」²。

軍事紀念碑的另一個作用，有可能往往是出自於一種不安全感，為了向大眾證明正當性，甚至也是為了應對其他民族或國家的挑戰(Jager, 2002)，如同國共間發生的海戰，在雙方各自的史料記載中，通常都是各自表述勝利，「九二海戰」在中共方面也是宣稱舉得部分勝利，甚至拍攝影片宣傳當時中共魚雷快艇的英勇，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勝利紀念碑也具有爭奪話語權意味，因此紀念碑不應該只是一塊鑲嵌金色文字的石頭，而是必須具有深深刻意義，甚至在幾百年後仍然被後世所傳唱(Sørensen, 2016)。

紀念碑從此不僅只是單純的建築物，在軍中豎立的紀念碑，透過對紀念碑的解釋、儀式等活動，其實也使眾多的官兵也被紀念碑所形塑，我國海軍強調精神戰力是致勝關鍵，因此在形塑的重點著重在精神戰力方面，紀念碑不僅成了建構精神戰力的平台，並且產生「規訓」(discipline)的功能，來確保這樣的精神得以傳承，此時官兵成為了紀念碑的信仰者，確保了精神戰力的來源，紀念碑就是精神戰力的一種

² 原文為“*We shape our buildings, and afterwards, our buildings shape us*”。

種具體可視的建築，當看見紀念碑的時候，將使得曾經有關的「台海精神」做連結，回想起那不斷在被強調的傳統精神，另外紀念碑所在的空間位置，所形成的空間秩序，都將形成一種權力上的保證。

建築物帶來的規訓作用可以從設計上來看，紀念碑的本身白色下寬上窄的造型，就像砲彈激起海面的浪花，另外在紀念碑的四面，也鑲嵌有不同意義的匾額：

- 一、北面：鑲有陸戰隊所獲之虎旗一面，下方為前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所題銘「臺海長城」
- 二、南面：是鑲有沱江艦獲頒之虎旗一面，下方為前國防部長俞大維先生的題銘「橫海銘勛」。
- 三、東側：即為紀念碑正面，鑲有匾額兩副，上匾為前副總統陳誠先生題銘「昭烈銘功」，下匾為前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先生題銘「心如日月氣如宏海上振英風」。
- 四、西側：即面對軍港哨口，則是鑲有紀念碑全文。

從建築物所在地點來看，紀念碑座落位置在營區內哨口前圓環，使得要進出哨口的海軍官兵勢必通要經過紀念碑，而且圓環的設計必須要繞著紀念碑逆時針行走，並且海軍陸戰隊與沱江艦所獲頒的兩面虎旗圖樣，以及高階長官題銘的匾額，鑲嵌紀念碑簡單易識別，形同圓環已經限制了官兵行動，規訓著官兵必須以「九二台海勝利紀念碑」為中心並且看著在紀念碑上代表勝利及被長官肯定的圖樣，就像是利用紀念碑不斷帶給官兵重複的訊息，使得大腦習慣這些內容，進而在離開那個場域時，依然在精神上持續存在著慣性。

又或者說這是一種獲取戰功後的榮譽保證，紀念碑揭幕的報導中，提到黎玉璽總司令提到，紀念碑的頂端已經預建了塑立銅像的基礎，未來在海戰中，首功人員將會立銅像於碑上（〈臺海戰役勝利紀念〉），

1964)，塔上的空位也給了官兵更多的想像空間。

第四節 定時的紀念慶祝會

每年「九二海戰」紀念慶祝會的目的，不僅是定期對先烈或戰功的緬懷，其實也可以看做是一種規訓的定期檢查，從傅柯對於規訓的看法，在軍中的典禮都存在的固定的排場及規定的儀式，這無形之中也成為了權力的關係，因此也有了規訓的作用。

從不同角度來看慶祝會，其實也是一種各取所需的舞台，例如在1991年波斯灣戰爭結束後，戰爭的勝利及大規模的慶祝活動，使得美國士兵成功扭轉在越戰時期在人民心中的印象，保守派藉由這些志願軍的精神，宣傳政治理念達到政治目的，軍火商希望藉此減低對國防預算縮編的影響及企業視其為廣告商機(Fitzgerald, 2019: 3)，因此雖然表面目的都是為了參戰軍人及戰爭勝利而慶祝，但實際上在不同的身分下卻有不同的目的，而相對我國的「九二海戰」每年的慶祝大會，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除了存在原本對戰役的緬懷外，也另外隱含了許多目的在其中，整理歸納在慶祝大會中的一些經常舉辦活動，可以看出其中具有不同的隱藏意義：

一、結合畫展及寫真展

民國53年的五週年慶祝大會配合舉辦戰史圖片展、六週年舉辦梁中銘的料羅灣海戰圖畫展及八週年紀念的忠義美展等，都是結合藝文給軍民參觀的活動。

由於戰鬥的過程對畫家幾乎是沒有畫面，使得有些畫家不願描繪，因此不難理解軍事圖畫可能出自於特定需求，也就是說為了宣傳士氣(Vagts, 1941)，因此除了前述照片對於形象的建立外，透過軍事戰爭的圖畫，使得當時軍民對於海戰的想像，也產生有

不同的正面效果。

但也有展覽的內容並非軍事內容，如民國109年的61週年，舉辦的「紀念九二海戰六十一週年攝影特展」，特展內容除了以海軍艦隊為題材外，「軍中人權促進會」創辦人陳碧娥（黃媽媽），也在其中展出鳥類專題攝影作品，來象徵「親子」間關係（何弘斌，2019），雖然與軍事無關，但卻是軍方與人權團體的首次結合，改變軍方原本與人權的對立，也有助於提升民眾觀感。

二、導入勳獎頒授

在大部分的慶祝會中，都會安排勳獎頒授的行程，不僅可以重申士官兵的信仰，從而提高了戰場上的士氣，而勳獎其實也隱含了軍隊中，不同於階級的地位象徵(Blake, 1973: 173)，也就是在士官兵的行為上，加註了一種具有規訓意義的註解，也就是只有符合優秀行為的軍人，才能獲得勳獎。

從「九二海戰」的年度慶祝大會中，對年度內符合「忠勤勳章」人員的頒授儀式，便可以看到這種規訓模式，該勳章是對服役滿十年的軍人一種肯定，獲頒者可以在退伍後享有榮民的身分及權利，但獲頒資格並非以年資作為評斷標準，是依據「國軍勳賞獎懲作業實施要點」第五十八條，需要在近十年內考績，曾考優等三次，或最低為甲上一次、甲等八次、乙上一次；或者在十年內，曾受過現職相稱之陸海空軍獎章、光華獎章、干城獎章，而當年考績特優者，這意味著階級越高也不一定代表曾獲頒「忠勤勳章」，因此反而會造成一種心理壓力，隨著同儕、晚輩陸續有人獲頒的情況下，一種「認為你應該要有」的眼光，形成個人在單位裡，行為舉止的壓力，進而成為規訓的力量。

三、舉辦聯歡晚會

聯歡晚會舉辦除了在慶祝當年的海戰勝利，另外在晚會之中的藝工隊演出，也有慰勞官兵辛勞的作用，有時甚至聘請當紅影歌星來表演，來提升現場的氣氛，從形象的角度來看，這就如同知名人士代言一般，特別一些在大眾眼中，已存在既有愛國、正義等正面形象的名人，更容易提升形象(Park & Avery, 2016: 12-13)。

回顧民國82年9月2日青年日報，以「英雄惜英雄」來報導當年度的慶祝晚會，並以邀請當時常飾演警察的成龍來上台演出，版



圖 5-3 明星穿著海軍制服照

資料來源：黃惠婷（1993年9月2日）。英雄惜英雄 左營勞軍晚會熱歌勁舞。青年日報，第9版。

面中附上成龍穿上白軍服的照片（圖5-3），再加上成龍自述想加入海軍，嚮往白軍服的報導內容（黃惠婷，1993），無形中提升了海軍官兵的優越感，也產生代言認同的效果。

四、宣誓效忠大會

在1972年的「九二海戰」紀念日時，青年日報報導當年度的

莒光艦，在艦上舉行宣誓大會，在艦長的率領下，表達對領袖的效忠，並且在誓詞中強調國際對共匪的姑息，另外也邀請曾參加「九二海戰」的英雄參加宣誓(圖5-4)，更有精神傳承以意味(〈慶祝「九二」台海勝利紀念〉，1972)。

另外在軍隊的宣誓大會，還有權力關係鞏固及職責賦予確定的意味，甚至以往也當作掌權者不信任部屬時的一種制約手段，透過宣讀誓詞的表現，一經執行就無法忽視與掌權者的關係(Nauman, 2014)，無形中也加深了服從的規訓力量。

回顧當時我國適逢外交重大變節，1971年10月我國退出聯合國，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隨後不久與中共簽署《上海公報》，雙方尊重各自主權及領土完整，並互不干涉內政，中美斷交之氛圍不言可喻，此時的宣誓效忠大會，在表現最優秀的艦艇及參戰英雄的形象下，更能鞏固領袖當時的領導地位。



圖 5-4 海軍艦艇官兵在艦艙舉行宣示效忠大會照

資料來源：溫世暘（1972年9月2日）。
海軍四十三號艦官兵舉行效忠宣誓。青年戰士報，第2版。

第六章 結論

本文從「看不見」的「九二海戰」開始敘述，以形象的相關理論角度切入，首先了解到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軍隊有絕對爭取話語權的必要，因此藉由建構符號的過程，確定了「九二海戰」的言談，接著析當時的海軍士氣調查報告以及宣傳手段，發現其實「九二海戰」就是一個自我建構的過程，在過程中利用彈孔、女性及慶功大會等方式，逐漸建構出一場勝利的海戰，並也創造出得以讓海軍傳承至今的「台海精神」，透過上述研究過程，本章以下將以形象及規訓觀點，對「九二海戰」提出結論與建議。

壹、「九二海戰」的意涵隨政策而演變

在反共復國的背景下，「台海精神」成了支撐部隊作戰的關鍵，因此在揉合象徵以及空間的概念，建造了精神堡壘「九二台海勝利紀念碑」，並成為了一種規訓的力量，也讓海軍得以每年度藉著緬懷的紀念活動，重新複習對官士兵的規訓，但隨著時代的演進以及兩岸情勢的變遷，「九二海戰」所象徵的精神意義也不斷的在改變。

演變至今，「九二海戰」至今仍是每年海軍著重紀念的日子，特別是在重大軍事政策推動階段，海戰的「台海精神」成為一個鋪陳，使政策有了例證上的立足點，強化了正當性，但也造成越多廣義的解釋，進而淡化原本歷史的原貌，在覆以戰爭型態的改變，飛彈射程遠、精準度高，且在聯合作戰的思維下，海軍難以在像以往，接近到艦砲射程實施攻擊，戰史的細節及作戰過程更不易被著重。

然而，自「九二海戰」後，我海軍再也未發生取得重大戰功之海戰，黎玉璽總司令所期待「九二台海勝利紀念碑」上，預留給取得重大戰功英雄的銅像位置，至今仍是空缺。兩岸的關係雖然從對峙到和緩，但中共仍未曾放棄武力犯台，隨著中共航母建立成軍，及中共戰

機繞台挑釁，迫使反共的意識再度被激起，刻正結合當初沱江艦反共的精神象徵，促成我海軍新一代沱江艦的誕生，產生了再次創下光輝海戰的希望。

貳、逐漸薄弱的形象與規訓

雖然「九二海戰」不斷的承接新的意義，但海戰所創造的「台海精神」卻也在意義的演變中，逐漸有了改變。現今在科技進步與網路發達，個人權益抬頭，軍中人權意識高漲，軍民對於繁瑣的儀式或舊有規範，開始存有疑慮，認為在時代的變遷中，部分既有的儀式應視為陋習加以禁止，例如「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中，對於「國軍晚點名口號內容」希望檢討調整（總統府，2004），最後卻演變成廢止國軍各部隊「呼口號」及不再宣讀「中華民國陸海空軍軍人讀訓」（許紹軒，2004），所幸在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建議下，由當時國防部長陳肇敏核准自2008年6月10日起，恢復在國軍慶典儀式及月會上朗讀軍人讀訓（國防部，2008）。以及在2005年3月1日廢除軍中的晚點名制度，雖有呼聲恢復但仍有爭議（王炯華，2008），但這些對原本提升士氣的制度及儀式的刪減，也意味著對規訓的弱化。

因此反觀我們對於「九二海戰」的想像，仍舊建構於鋼盔、彈孔、女人、圖像及紀念塔等，這些形象雖然成就了我們現在認知的勝利，但卻難有相較於當年產生自我認同的作用，原因在於從鏡像理論角度來看，現今的海軍狀況，不同於「九二海戰」當時的處境，已經有大幅的進步，逐一檢視當時造成士氣低落的因素，無論是生活條件、人事補給制度、婚姻自由等，均以大幅改善，另外兩岸間也未存在即刻性的威脅，使得「他者」的角色越來越薄弱，再者，從「九二海戰」中所創立的「台海精神」雖然隨著時間的演變，不斷的承載新的意義，

但到了 2010 年之後，青年日報在紀念日的報導中，幾近未出現此「台海精神」，字眼，似乎也意味著規訓的作用逐漸弱化。

參、形象建構地位，提升軍人士氣

士氣是軍隊達成任務的關鍵因素之一，士氣的起落與別人的眼光有極大的關係，更可以說是，自己認為被別人以何種的眼光所看待，因此如何從他人眼中確認自己的形象，就成了關鍵因素。反思目前對於「九二海戰」的形象建構，仍有許多操作空間，例如在電影產業方面，如陸軍的《黃埔軍魂》、空軍的《笕橋英烈傳》、甚至中共當年為了魚雷快艇所拍攝的《海鷹 1959》等，無非是為了提升軍種形象。再者，從「鏡像階段」理論應用在電影機制上，也是一種產生認同影像的過程，

「九二海戰」雖然僅兩小時，但其中有海上生活、駁火戰鬥、捨己救人、損害搶救，甚至也有兒女私情，以往的「以寡擊眾、冒險犯難、互助合作、同舟共濟」等精神在過程也表露無遺，這是海軍官兵應該有的行為準繩，也是期盼民眾對海軍的印象，因此這些歷史的過往，如果能透過更多影像表達，勢必也能成為提升士氣的方式之一。

肆、從理論檢視「九二海戰」價值

即使當前尚未與中共發生軍事上之衝突，但其實有關輿論、謠言等言語方面的心戰卻是無時無刻在進行，企圖讓我方產生疑惑，打擊我軍心士氣，而我方如何在現有的素材下，強化心戰方面作為，成為不可忽視之要點。

因此總結本文中所提到的理論角度，檢視「九二海戰」對於現今海軍之價值，筆者認為「九二海戰」雖然已結束許久，但卻進入了一場符號的戰爭，也是一場話語權的戰爭，相較於其他海戰而言，「九

二海戰」至今仍有規訓、形象建構的功能，以及許多符號，可以乘載不同的概念，進而將傳統精神自然化，強化官兵意志統合。

最後，歷史的資料因人解讀而異，但精神堡壘卻不會因此倒下，「九二海戰」的勝利與否，其實已經不再是重點，或者說，「九二海戰」真正的勝利，在於當時創造了一個海軍得以在領袖面前改頭換面的里程碑，使得海軍的精神力量有了泉源，從這個角度來看，往後如何在兩岸關係及國防政策中詮釋「台海精神」，以及如何藉由此精神結合現代海軍運作型態，才是「九二海戰」將來能帶來的核心價值。



參考文獻

壹、中文

- 一年來的海軍輝煌戰果。(1959年1月1日)。中國時報，第3版。
- 九二海戰同舟共濟錨鍊精神以寡擊眾。(2002年9月2日)。青年日報，第3版。
- 卜耀宗(2011)。九二海戰精神戰力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45(4)，41-54。
- 中央氣象局(1958)。颱風警報單。2020年12月26日，取自：https://rdc28.cwb.gov.tw/TDB/public/typhoon_detail?typhoon_id=195813。
-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2008)。中國戰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中國延安文藝學會(1997)。1927-1997世紀的步伐 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錄。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 中華民國總統府(2016)。視導沱江軍艦 總統盼團結合作實現國防自主 打造新海軍。2020年6月30日，取自：<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0479>。
- 王立申(2005)。六二特遣部隊的故事。臺北：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 王官德(2005)。析論共軍在對臺政策上的角色、立場與變數。國防雜誌，20(1)，31-40。
- 王焯華(2008)。《我愛中華》軍歌 擬解禁 晚點名恢復 國防部已在評估。蘋果日報。2020年11月18日，取自：<http://city.udn.com/57293/2978827>。
- 王榮川等作(2009)。臺灣戰史彙編-精神戰力之部。桃園：國防大學。
- 王冀成(1999)。海獵：共和國海戰紀實。北京：西苑出版社。
- 地久、克鋒(1994)。潮漲潮落 國共角逐台灣海峽紀實。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 朱泰榮(1995年9月2日)。九二精神 海軍圭臬。青年日報，第4版。
- 何弘斌(2019)。紀念九二海戰61週年攝影特展 揭幕。雅虎新聞。2020年11月18日，取自：<http://tw.news.yahoo.com/紀念九二海戰61週年攝影特展-揭幕-160000891.html>

- 吳叡人(譯) (1999)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Benedict Anderson 原著)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呂欣懃 (2014) 。嚴明：沱江艦亞洲最快火力最強。中央社。2020 年 7 月 30 日，
取自：<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412230107.aspx>。
- 李羽蝶 (2017) 。國軍招募文宣出包 網友：自掘墳”墓”的概念。自由時報。2020 年
7 月 30 日，取自：<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49326>。
- 李耀杉 (2005 年 9 月 2 日) 。九二海戰制海作戰教範。青年日報，第 6 版。
- 汪珍 (1987 年 9 月 2 日) 。追憶九二海戰官兵血肉築長城今仍豪情萬丈。青年日
報，第 5 版。
- 姚開陽 (2017) 。**1949 大叛艦：Mutinies on Ships of 1949**。臺北：蒼壁出版社。
紀念九二海戰勝利 海軍秋祭忠烈將士。(1988 年 9 月 1 日)。青年日報，第 2
版。
- 英雄劉溢川 昨締白首盟。(1962 年 8 月 27 日)。中國時報，第 3 版。
- 軍事科學院軍事圖書館 (2000) 。**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徐焰 (1992) 。**金門之戰**。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徐鳳佳、莫小亮與周小舟 (2019) 。我的家鄉我的艦：走進新一代「海上猛虎艇」
泉州艦。中廣網。2020 年 7 月 30 日，取自：[http://military.cnr.cn/ycdj/20190906/
t20190906_524766961.html](http://military.cnr.cn/ycdj/20190906/t20190906_524766961.html)。
- 料羅灣海戰記——南巡支隊痛殲十二匪艇。(1958 年 9 月 5 日)。中國時報，第 3
版。
- 海軍總司令部 (1971) 。**七海雄風**。臺北：海軍總司令部。
- 海軍總部 (1957 年 12 月 9 日) 。一.十一月二十日(46)璽怒字第 3777 號呈件均悉。
二.逍遙灣戰役獎勵案已另令核示外查此次作戰部隊對戰果報導實有誇大不實之
情事如屬明知故為殊為不當按誇大戰果或虛報戰功著均為軍紀所嚴禁今後我海

軍艦艇部隊對戰果呈報應須實情實報不作誇大宣梁等，**海軍北區巡邏支隊戰鬥報告彙輯**。國防部，檔號：46_543.5_3815_1_44，總檔案號：00025663。

海軍總部（1958年8月30日）。為函請惠告「海軍戰果處理辦法」修正意見由，**勳獎法規彙輯**。國防部，檔號：41_340_2432-2_6_22，總檔案號：00015343。

海軍總部（1958年9月30日）。為拆移沱江機件由，**海軍總部備忘錄(四十七年)**。國防部，檔號：47_157_3815-6_7_17，總檔案號：00011128。

海軍總部（1962年7月11日）。<一>查貢江艦曾於本年四月三日在東碇海面砲擊匪區類似漁船又於五月十六日誤擊我運補東碇之 LCM 該艦均虛報為射擊匪快速目標以求功績已予該處<二>邇後對戰果報告應確實遵照總部作戰手冊第六章第四節「海軍各級部隊戰果報告原始資料之根據條件及鑑定方法項，**作戰資料暨作戰檢討案**。國防部，檔號：39_546_2821_11_15，總檔案號：00026921。

海軍總部（1968年6月1日）。賚呈「海軍歷次海戰經過檢討報告」兩份(如附件)恭請鑒核，**歷次海戰檢討案**。國防部，檔號：57_0541_7121_1_4，總檔案號：00043112。

國防部（1957年8月12日）。具呈鈞部四十四年度艦艇士氣視察重大問題辦理情形請鑒核由，**國軍士氣調查案**。國防部，檔號：45_017.3_6015_1_5，總檔案號：00002305。

國防部（1957年8月17日）。呈覆四十四年度艦艇部隊士氣總報告所列缺點改進情形謹呈鑒核由，**國軍士氣調查案**。國防部，檔號：45_017.3_6015_1_4，總檔案號：00002305。

國防部（1958年2月7日）。呈士氣視察報告恭請鑒核由，**國軍士氣調查案**。國防部，檔號：45_017.3_6015_1_13，總檔案號：00002305。

國防部（1958年3月20日）。頒發光華會議決議案第一案暨實施要點希遵照由(士氣)，**國軍士氣調查案**。國防部，檔號：45_017.3_6015_2_16，總檔案號：00002306。

國防部（2008）。本院李委員俊毅，針對過去停止朗讀的軍人讀訓，國防部長陳肇敏批准恢復，行政院應與時俱進，予以修改軍人讀訓之內容，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2020年11月18日，取自：[http://query.ey.gov.tw/legisWeb/webQuery.aspx?sys=630&funid=lgresult&term=7&ses=1&srctype=1&subnm=國防部\(組改前\)&unit_id=305000000&dunit_id=300000000&currec=1&totrec=83](http://query.ey.gov.tw/legisWeb/webQuery.aspx?sys=630&funid=lgresult&term=7&ses=1&srctype=1&subnm=國防部(組改前)&unit_id=305000000&dunit_id=300000000&currec=1&totrec=83)。

國防部軍務局（1998）。八二三台海戰役。臺北：國防部軍務局。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2014）。中華民國海軍軍官指南。臺北：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2003）。英雄之歌。臺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

崔京生（2007）。新中國海戰檔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常勝君（1958年9月20日）。海上殲滅戰—一〇四號砲艦的英勇戰績。中國時報，第3版。

張亞中、李英明（2000）。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概論。臺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張明初（2017）。驚濤艦魂。臺北：星光出版社。

張庭（2013）。社會研究法(含概要)。臺北：志光教育文化出版社。

張壽齡、江毓鉉與周宜慶（2015）。江海歲月—江字號軍艦的故事。臺北：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張壽齡、周宜慶與張彩玥（2016）。鎮海靖疆 左營軍區的故事。臺北：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張壽齡等人（2008）。緬懷九二—臺海戰役50周年紀念專輯。臺北：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許世宗（2015）。從沱江艦戰史論新時代海軍精神。海軍學術雙月刊，49（6），77-87。

許紹軒（2004）。軍中取消讀訓、呼口號。自由新聞網。2020年11月18日，取自：<http://old.ltn.com.tw/2004/new/sep/3/today-t1.htm>。

- 陳清茂 (2018)。忠義捍海疆 滄海弔英靈-論九二海戰展現之臺海精神。載於**第九屆軍人武德與品格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頁 69-81)。桃園：國防大學。
- 發揚台海精神完成反攻復國使命。(1964年9月2日)。青年戰士報，第2版。
- 發揚台海精神爭取更大勝利。(1966年9月2日)。青年戰士報，第2版。
- 發揚台海精神海軍盛會紀念勝利。(1970年9月3日)。青年戰士報，第2版。
- 發揚台海戰役精神爭取軍人最高榮譽。(1962年9月3日)。青年戰士報，第2版。
- 黃惠婷 (1993年9月2日)。英雄惜英雄 左營勞軍晚會熱歌勁舞。青年日報，第9版。
- 黃傳會、舟欲行 (2007)。雄風-中國人民海軍紀實。北京：學院出版社。
- 溫世暘 (1972年9月2日)。海軍四十三號艦官兵舉行效忠宣誓。青年戰士報，第2版。
- 翟志瑞、李羽壯 (1994)。金門紀實-五十年代台海危機始末。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翟紹華 (1993/5)。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 臺海戰役勝利紀念 海軍官兵熱烈慶祝 紀念碑在基地隆重揭幕。(1964年9月3日)。中央日報，第1版。
- 劉毅夫 (1989年9月2日)。再創「九二」海戰勝利光輝戰果。青年日報，第5版。
- 潘淑滿 (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市：心理出版社。
- 鄧熹 (2001)。老軍艦的故事。臺北：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 駐閩海軍軍事編彙室 (1990)。福建海防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賴名湯 (2016)。賴名湯日記(二)民國五十六~六十年。臺北：國史館。
- 戴志揚 (2019)。「航母殺手」二代沱江艦今開工 蔡英文親主持。中時新聞網。2020年7月30日，取自：<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5240013>

03-260402?chdtv。

總長辦公室（1956年6月6日）。為海軍士氣視察報告有關建議部份檢討會議紀錄隨文附發限六月十日前報部彙辦，**軍紀糾察與督導**。國防部，檔號：44_1341.2_1_3750-4_1_8，總檔案號：00049840。

總長辦公室（1958年10月1日）。海軍金門作戰檢討報告(編號：01)，**金門砲戰檢討案**。國防部，檔號：47_0541_8010_2_2，總檔案號：00043115。

總長辦公室（1958年10月22日）。為函送海軍金門作戰檢討報告由，**金門砲戰檢討案**。國防部，檔號：47_0541_8010_9_7，總檔案號：00043122。

總長辦公室（無日期）。海軍總司令部金門砲戰作戰檢討報告(編號 001)，**金門砲戰檢討案**。國防部，檔號：47_0541_8010_6_11，總檔案號：00043119。

總統府（1956年5月3日）。為呈四十四年度海軍艦艇部隊士氣視察總報告及重大問題請鑒核由，**國軍士氣視察報告**。國防部，檔號：42_0600_6015-5_1_5，總檔案號：00044211。

總統府（1957年5月13日）。為呈海軍艦艇部隊及海軍陸戰隊士氣視察所列重大問題研辦情形報告表恭請鑒核由，**國軍士氣視察報告**。國防部，檔號：42_0600_6015-5_2_1，總檔案號：00044212。

總統府（1958年10月16日）。為對激勵金馬守軍士氣案辦理情形報請鑒核由，**國軍士氣視察報告**。國防部，檔號：42_0600_6015-5_2_6，總檔案號：00044212。

總統府（2004）。**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2020年11月18日，取自：<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294/35831/>公布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鍾淑惠（2015）。從圖像看日本對甲午戰爭的宣傳。**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3，45-82。

貳、英文

- Å se, C. (2020). Rationalizing military death: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military monuments in Berlin and Stockholm. *Critical Military Studies*. Retrieved November 20, 2020, from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citedby/10.1080/23337486.2020.1730126?scroll=top&needAccess=true>.
- Axelrod, A. (2009). *Patton's Drive: The Making of America's Greatest General*. Guilford, CT: Lyons Press.
- Barnett, F. R., & Lord, C. (1989). *Political Warfare and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Rethinking the US Approach*. Washingt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 Barthes, R. (1972). *Mythologies*.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 Bartky, S. L. (1997). Foucault, feminini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 In Katie Conboy, Nadia Medina, and Sarah Stanbury (Eds.), *Writing on the Body: Female Embodiment and Feminist Theory* (129-15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ernays, E. L. (1942). The marketing of national policies: A study of war propaganda. *Journal of Marketing*, 6(3), 236-244.
- Blake, J. (1973). The 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r in three wars. *The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16, 166-176.
- Boulding, K. (1956). *The Image: 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rooks, C. (2019). Gregg A. Brazinsky.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4(5), 1866-1867.
- Burke, P. (1997).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hew, M. (2007). Contemporary re-emergence of the Qipao: Political nationalism,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opular consumption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dress. *The China Quarterly*, 189, 144-161.

- Culler, J. (2002). *Barthe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England: Oxford.
- Cumming, A. (2008). The warship as the ultimate guarantor of Britain's freedom in 1940. *Historical Research*, 83, 165-188.
- De Beauvoir, S. (2010). *The Second Sex*. New York: Knopf.
- Elkins, J., & Naef, M. (2011). *What is an Imag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Esherick, J., & Combs, M. T. (2015). *1943: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Ithaca, NY: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 Evans, D. (2006).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Routledge.
- Fitzgerald, D. (2019). Support the troops: Gulf War homecomings and a new politics of military celebration. *Modern American History*, 2(1), 1-22.
- Global Security (1997). Field Manual No. 7-21.13 Appendix C Ceremonies Section III - Memorial Ceremony. Retrieved July 20, 2020, from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cy/army/fm/7-21-13/appc.htm>
- Graber, D. A. (1994). The new propaganda: The dictatorship of palaver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6(1), 267-270.
- Guéguen, N., Martin, A., & Stefan, J. (2017). Holding your flag: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a regional symbol on people's behavio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7(5), 539-552.
- Homer, S. (2004). *Jacques Lacan*. New York: Routledge.
- Howard, J. (2015). "Music for a national defense": Making martial musi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4, 238-284.
- Jager, S. (2002). Monumental histories: manliness, the military, and the war memorial. *Public Culture*, 14(2), 387-409.

- Leader, D. (2014). *Introducing Lacan: A Graphic Guide*. London: Icon Books.
- Linebarger, P. M. A. (2010). *Psychological Warfare*. Penn Valley, CA: Gateways Books & Tapes.
- Lippmann, W. (1998). *Public Opinio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Marks, R. (2006). Asian tigers: The real, the symbolic, the commodity. *Nature and Culture*, 1, 63-87.
- McCombs, M. E., Shaw, D. L., & Weaver, D. H. (2013). *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 : Exploring the Intellectual Frontiers in Agenda-Setting Theory*. Hoboken: Taylor and Francis.
- Merrill, J. C. (1962). The im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en Mexican Dailies. *Journalism Quarterly*, 39(2), 203-209.
- Merrill, J. C. (1965). How Time stereotyped three U.S. presidents. *Journalism Quarterly*, 42(4), 563-570.
- Morris, C. (1957). The image: 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 Kenneth E. Bould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1), 112-113.
- Mullen, L. J. (1997). The president's visual image from 1945 to 1974: An analysis of spatial configuration in news magazine photograph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27(4), 819-834.
- Nauman, S. (2014). Winning a war with words: Oaths as means in military conflict in early modern Scandinavia.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39(2), 198-211.
- Ng, S. (2015). Gendered by design: Qipao and society, 1911-1949. *Costume*, 49, 55-74.
- Park, S., & Avery, E. (2016). Effects of patriotism and celebrity endorsement in military advertising. *Journal of Promotion Management*, 22, 1-15.
- Pratkanis, A. R., & Aronson, E. (2001). *Age of Propaganda: The Everyday Use and Abuse of Persuasion*. Broadway, New York: Macmillan.

- Qi, Y., Fan, X. R., & Cui, R. R. (2013). Qipao in a university museum collection of China, 1912-1949.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821-822, 713-716.
- Ranci re, J., & Elliott, G. (2009). *The Future of the Image*. Brooklyn, New York: Verso.
- Salkind, N. J., & Rasmussen, K. (2008).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Scriven, S. (2015). War propaganda.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25, 395-400.
- Smart, B (1985). *Michel Foucault*. Hemel Hempstead, England: Ellis Horwood.
- S rensen, B. (2016). Public commemorations of Danish soldiers: Monuments, memorials, and tombstones. *Critical Military Studies*, 3, 1-23.
- Vagts, A. (1941). Battle-scenes and picture-politics.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5(2), 87-103.
- Vail, K., Arndt, J., Motyl, M., & Pyszczynski, T. (2012). The aftermath of destruction: images of destroyed buildings increase support for war, dogmatism, and death thought accessibi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5), 1069-1081.
- Yan, Lan Lan, Bian, Xian Yang, & Feng, Mng Yang (2014). On the contemporary cognition of Qipao' design.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1048, 201-206.
- Zorlu, T. (2008). Ottoman ship launching ceremonies: a practice between symbols and rit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urkology*, 1(1), 55-63.